

楚剧定名绵延百年芳华

“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这是1956年昆曲《十五贯》大获成功后，周恩来总理给予的赞扬。1926年9月10日，武汉戏剧界筹备湖北剧学总会，将黄孝花鼓戏定名为“楚剧”，或许创下“一次定名壮大一个剧种”的传奇。

百年芳华，武汉楚剧院主办庆典晚会，从“风起乡野码头寻梦”到“江城重光姹紫嫣红”，恰好描绘出定名前后的“两重天”。

2014年3月4日，拜望楚剧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钟惠然，93岁的老艺术家谈起源流一脸沧桑。定名前，花鼓戏总在边边角角打场子，难登大雅之堂。定名后，楚剧赶上北伐军攻克武汉，新市场更名中央人民俱乐部，1927年大年初一破天荒入内首演，以革新戏《小尼姑思凡》《吕蒙正赶斋》开锣，被《汉口民国日报》赞为“楚剧革命第一声，平民艺术的新纪元”，跨出了从“定名”到“正名”的历史性一步。

1951年，武汉楚剧团成立，“京汉楚”三大剧种并立江城。从黄孝河游进长江汉水，楚剧蛟龙得水行云天下。武汉一批军需员工南下支援岳阳336军工厂，父亲兼管的俱乐部将楚剧唱到洞庭湖畔，《白扇记》《蝴蝶杯》等硬功戏都盘得出角来。

天山脚下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有楚剧团，根据维吾尔族神话故事创编的《西琳与帕尔哈特》，1963年回娘家武汉演出。巧的是，2017年10月，我在晴川阁“楚剧遗珍”展遇上了一批特殊参观者，日记记载“原是武汉戏校楚剧科学生，1965年支援新疆建设兵团，集体组建农七师楚剧团”。

楚剧走向全国，银幕打开一方天。1950年代上海天马连拍《葛麻》《刘介梅》，1970年代北影、长影各拍《赶会》《追报表》，今年5月12日《向警予》首映，地方剧种插上光影之翅。

曾经，楚剧剧无定本且剧目单调，观众笑之“花鼓戏开了锣，不是《喻老四》就是《张德和》”。而今，传承500出，常演200多，《荞麦馍赶寿》《杨乃武与小白菜》广受市井追捧，《四下河南》《狸猫换太子》连台本戏不歇。1966年，武汉楚剧团有实力分出人员，成建制创立湖北省楚剧团。2006年，楚剧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楚剧定名百年，老窝子楚风剧院引发集体怀念，视频、图片、博文网上流传。1916年，汉口济生四马路（今前进四路）出现一家剧院“长乐”，比楚剧定名还早10年。日军入侵更名“东和”，抗战胜利更名“民乐”，共和国成立更名“大众”，1966年更名“长征”，1982年更名“楚风”，时代变迁浓缩其中。叫“长征”时，我看过反映长征的电影《万水千山》；叫“楚风”时，请父亲看过何祚欢编剧的《穆桂英休夫》。当新潮娱乐冲击传统戏曲，剧院办过楚风金城、楚风网吧，如今融入楚宝里更新片区。

武汉楚剧团团部原在“楚风”对街的永康里，2012年迁至解放公园旁，新建剧场“楚乐”，从“楚风”穿回“长乐”。明年，又将入驻月湖之畔的武汉戏曲艺术中心，更是今非昔比了。

（简桦）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罗联峰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子渝 刘玉堂 刘庆平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张笃勤 陆永初

陈芳国 姚伟钧 涂文学 彭小华

编委会主任：陈诗亮

副主任：朱向梅 刘洪波 董 菲

杨 华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海涛 王军振 王四清 刘海燕

朱永利 李 军 张智勇 李文洲

张冰峰 陈红英 林 伟 胡 蓉

唐云峰

主 编：陈诗亮

副 主 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 行 主 编：丁星火

特 约 编 审：简 桦

本期责任编辑：章旷怡

编 辑：许 濛 刘 玮

封 面 设 计：王 鹏

阅城偶记

<<< <

1 楚剧定名绵延百年芳华 / 简 桦

时代年轮

<<< <

4 1986，四十载铸就汉版文化名人文集品牌 / 邹德清

风雨同舟

<<< <

11 普特融合教育，照亮孩子成长之路 / 章 徊

九城同心

<<< <

16 田野上的旗帜——嘉鱼县官桥村八组改革发展纪实
/ 余 玮

委员天地

<<< <

23 行而不辍：教育视域的三次跃升 / 刘清旭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商聚汉皋



- 27 从英伦到江城：一个海归的“跨界”之旅 / 卢永雄

人物述林



- 31 冯玉祥创办汉口三户图书印刷社 / 李亚南
38 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留日风潮 / 陶光胜

都市寻踪



- 45 一叶香茗镌刻的文明足迹（上）
——万里茶道发展简史 / 周 耕
50 《武汉劝业奖进会笔记》前言
——“武汉劝业奖进会二题”之二 / 涂文学
55 汉口优秀历史建筑的流韵重塑 / 翁多嘉

往事漫忆



- 61 敬移老校长李达骨灰安放八宝山 / 任 怡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82220669（传真）

E-mail: whzxwszl@163.com

1986，四十载铸就汉版文化名人文集品牌

◇ 邹德清

轮印：40年——1986年9月23日，武汉出版社成立，开启打造汉版文化名人文集品牌，从一家地方小社成长为在全国有一定实力、地位和影响的中型出版社。

我是1990年夏天作为一个新兵走进武汉出版社的，当时租用黄浦路248号汉口兵站2号楼的二三层办公，第一层只有一间传达室和楼梯。听同事说，出版社最早租用的是在三眼桥的广水驻汉办事处办公楼，头一年才搬来这里。

建社之初条件很艰苦，只有市财政拨付的20万元开办费，加上市委机关调配的一辆上海、一辆伏尔加老款轿车，算是全部家

当，社负责人戏言“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直到1992年元月搬到购置的北京路20号新址，才算有了自己的窝。2000年12月，再迁新华下路103号（后变更为新华路490号）自建的办公楼，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2008年11月与石桥集团合资兴建武汉出版文化产业园，一期华中图书交易中心于2010年3月开业，2017年6月出版社入驻二期，更上一层楼。2018年5月，在新华路490号动工兴建武汉中心书城，2022年12月开业，菱角湖畔崛起了一座文化新地标。

与建楼和产业发展相对应的更有品牌建设，这才是出版社成长的内在动力，也是文化企业的根和魂。1980年代中后期，全

国出版界的格局已基本形成，省级出版社在总社的基础上孵化出多家专业出版社，中央各部委及高校出版社也雨后春笋般纷纷问世。武汉出版社是后来者，如何在强手如林的出版界找到立足之地，如何尽快推动品牌成长形成核心竞争力，是摆在新社、小社面前的重要课题。

武汉出版社一方面在发行量大的通俗理论读物和教育出版等方向发力，一方面依托学术资源编辑出版一批体量大的学术著作和销量大的畅销书，如：《明实录类纂》《北洋军阀史料》《辛亥革命辞典》《中国体育单项运动史丛书》《科学名著文库》《汪精卫评传》等。随之，《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新战争与和平》《生态文化与文明前景》等图书，先后斩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等重要奖项，在较短时间就取得了与老社、大社相比不弱的成绩。

而今，经过40年积累和沉淀，武汉出版社在主题出版、中国现当代文学、武汉城市历史文化、荆楚文化、长江文化、科普少儿教育等领域形成鲜明的出版特色，培育出“近现代文化名人文集”“长江的孩子”“武汉文脉”等一批辨识度较高的品牌，并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和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形态的冲击下，主动求变，迎难而上，实力不断增强，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

倏忽40年，出版社到了最好的年华，而我已作为一个退休老兵来回忆往事了，谨以汉版文化名人文集为例回顾其培育历程，并向武汉出版社成立40周年志贺。



《聂绀弩全集》出版座谈会

文化名人文集成为重点方向之一

出版社要尽快形成品牌认可度，打造既有地方特色又有全国影响力的标杆力作，是一条现实路径。对武汉出版社来说，深入挖掘地方文化资源，整理有影响力的文化名人或在全国有代表性的学术大家的著述，大有可为。为此，社领导酝酿编辑出版湖北籍包括在武汉工作生活过的文化名人文集，走访了许多名家，积累一些资源，筹划出版《何祚欢文集》及武汉本土作家文丛等开始尝试。

1990年代，社长彭小华提出编辑出版《聂绀弩全集》的设想，起步阶段虽然遇到一些波折，好在有一批与聂绀弩有交往的文化名人大力支持，特别是聂绀弩的外孙方瞳、方涓及聂绀弩生前身边工作人员周健强、姚锡佩诸位的全力配合，有市委宣传部领导的充分理解，我们坚持了下来。出版社成立了由彭小华直接领导的工作小组，刘昌钊任组长，我协助刘昌钊工作，组员有李杏华、吕植壮。

聂绀弩是湖北京山人，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兼古典文学研究部副部长、人民文学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与作者

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他是著名杂文家、诗人、文艺理论家，解放前杂文针砭时弊笔锋犀利产生广泛影响，被认为是鲁迅之后的杂文第一人；解放后在旧体诗创作和古典文学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编辑出版其文集无疑有重要意义。但工作起来，遇到的困难确实很大。首先要有编者，一般最好依托高校或研究机构的学者，或亲属及私淑弟子中对其创作熟稔者担纲，但聂绀弩的作品研究者不多，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中也缺乏长期从事文化工作且有编纂经验者，这意味着无法依赖外力完成。面对文化界人士对编辑出版聂绀弩著作的热切期待，以及很多专家认为要么不编、要么最好编全集的意见，我们压力巨大别无选择，只得采取编纂、编辑合一的工作模式，即资料收集、编纂等任务全部由工作小组承担。

编辑全集，首先要解决编辑方针和编辑体例问题，彭小华提出“立意要高，搜罗要富，反映要全面”的方针，要求克服再大的困难也要尽量收全，并对这项工作给予了多方面指导、支持和保障。工作小组边学习边摸索，先是借鉴一些已出版的名家全集，

拟定编辑方案，确定以初版和初次发表为主，依文体和发表时序分类编排的体例。然后，从阅读材料、寻找线索开始，走访全国各地与聂绀弩有交往的文化界人士数十人，阅读了聂绀弩自传、回忆录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回忆、纪念聂绀弩的文章及其他参考材料数百万字；走遍了聂绀弩生前创作和编辑活动的所有重要区域，直接访问或通过信函与北京、上海、香港、重庆、南京、广州、桂林等十余个城市的研究收藏机构反复联系，查阅解放前后的

报刊百余种计二千余册，获得聂绀弩在不同阶段出版的著作三十余种近六十个版本，以及大量的报刊文献、档案材料、手稿手迹、图片照片等，先后复印和抄录各类资料一千余万字，为全集编辑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进入梳理分卷、遴选甄别、考订注释，以及文字辨识和编校阶段后，更是加班加点，牺牲很多休息时间，精益求精保证了编校的进度和质量，使全集能在纪念聂绀弩百年诞辰之际如期出版。

最让人感动的是社会各界人士的无私支持，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著名诗人曾卓在医院的病床上给在京有关人士一一打电话请求支持；著名学者舒芜、诗人彭燕郊等将聂绀弩的书信一一细心整理好交给我们；何满子等专家对编纂方案和编排方法提出很好的修改意见；上海市社科院许豪炯、费万龙提供了聂绀弩著作编年；王存诚教授悉心审定书信和年表部分；周健强女士提供了她收藏的聂绀弩在历次运动中的37份检查材料，由当代史专家朱正亲自整理，以“运动档案”编入全集；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侯井天提供了多年收集整理并自费



《聂绀弩全集》

编印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良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程中原提供了聂绀弩致胡乔木、周扬的重要书信数通；著名书法家黄苗子应出版社要求先后题写“聂绀弩集”“聂绀弩文集”“聂绀弩全集”书名，有求必应，不厌其烦。正是有各方的大力支援，有专家的精心指导，弥补了我们资料占有和编辑经验的不足，使之能顺利完成这项要求高、难度大的工作。

2004年3月18日，10卷本《聂绀弩全集》出版座谈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全国政协副主席周铁农、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以及首都文化界著名人士梅志、舒芜、邵燕祥、黄苗子、郁风、严家炎等70余人出席。许嘉璐在讲话中说，《聂绀弩全集》的出版“为中国现当代文化史增添了光辉”。《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报》《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华读书报》等纷纷报道并盛赞全集出版。2006、2007年，《聂绀弩全集》分获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一套书获得两项国家级图书大奖，这在出版界难得一见。

《聂绀弩全集》一花引来众花开

《聂绀弩全集》的成功，使北京文化界认识了武汉出版社，很多文化界人士及其后辈，放心将文集交由武汉出版社出版。

最先响应的是著名诗人、翻译家、编辑家绿原，他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是武汉黄陂人，有浓郁的家乡情结，操一口纯正的黄陂口音。编辑《聂绀弩全集》之时，曾卓的电话有一通就是打给他的，他女儿刘若琴给予许多帮助，我们亲切地称之为若琴大姐。记得2002年初，《聂绀弩全集》尚在编辑中，曾卓就提议绿原文集交由武汉出版社出版，绿原和若琴大姐积极响应，我们迅速将选题列入出版计划。

《绿原文集》的编辑工作顺利多了，因为绿原本是资深出版人，若琴大姐也是编辑出身，在收录篇目、分类分卷、文字校勘，甚至字体字号选择、排版格式等方面，都给了很好的意见。每次收到绿原返回的校样，改动处都用淡绿色的记号笔一一标注，清朗俊逸的字迹，纹丝不乱的布局，完全不像出自一个年近八旬的老者之手。对我们这些年



武汉出版社社长彭小华与著名诗人绿原交谈

轻编辑来说，绿原的标注和改样不啻是一本编辑学教科书。遗憾的是，因为绿原的翻译作品很多，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为其出版译著的意向，我们只得忍痛割爱，书名也不能叫全集了，最后以6卷本的规模于2007年3月出版，收录了他除译著以外的全部作品。

《邵荃麟全集》的缘起也是《聂绀弩全集》的编纂。清华大学教授王存诚是邵荃麟的女婿，年轻时就结识聂绀弩并成为“聂迷”，对聂绀弩的文学活动轨迹、旧体诗、书信等方面有颇多搜集和考证，我们向他讨教颇多。交流中，我们得知他和妻子邵小琴搜集不少邵荃麟的著作、文章、资料，想编一套邵荃麟作品集。我们当即应承下来，鼓励他编辑全集。

邵荃麟是现当代重要的文学评论家、作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宣部副秘书长、中国作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等重要职务，1962年因提出“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等文艺观点遭到错误批判，出版其全集对当代文艺理论建设有重要价值。该项目获得2011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由于我已任出版社副总编辑，具体编辑任务就落到编辑部主任杨建文肩上。杨建文所学专业和我一样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他工作认真，带领编

辑团队出色完成任务。一是拟定编纂方案，明确收录范围、版本选择、编排分卷等重要事项；二是在邵荃麟亲属积累的基础上顺藤摸瓜，多方搜寻到许多其亲属也未曾掌握的著作、译著、散篇，经专家研判确定为邵荃麟作品，这对编辑全集来说至关重要，避免了落入“全集不全”的窘境；三是精编精校，高质量完成8卷本的全集编纂任务。王存诚总结说，《邵荃麟全集》和《聂绀弩全集》一样，“采取了革命性的编辑方针”“出版社行主编之实”，这个评价符合这两套书的运作实际。

《秦兆阳文集》的出版过程更有戏剧性。2004年秋的一天，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党组书记陈汉桥来电话，要我中午赶到市文联附近一个小餐厅，有事相商。我赶到后，见黄冈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作协主席刘民华，团风县作协主席华杉在座。原来，团风籍文化名人秦兆阳的女儿秦晴、女婿陈恭怀都在北京文化界工作，编辑了自家老人的文集，希望能在武汉出版。

秦兆阳曾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并先后在《文艺报》《人民文学》《当代》等刊物担任领导工作，发现并培养了峻青、曲波、王蒙、路遥等重要作家，1957年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遭到错误批判，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作家、编辑家，文集的出版价值也很高。我向两位来客介绍了我社编辑出版文化名人文集的情况，还谈到我对秦兆阳的作品也比较熟悉，刘民华、华杉随身带着几大包书稿，当场表达了在武汉出版社出版的意向。随后，我陪彭小华到团风县，与县委宣传部部长陆续中进一步洽谈，敲定了合作事宜。不久，我社编辑李杏华赴京出差，我委托她拜访秦晴、陈恭怀，沟通也十分融洽。此后近两年时间，



《邵荃麟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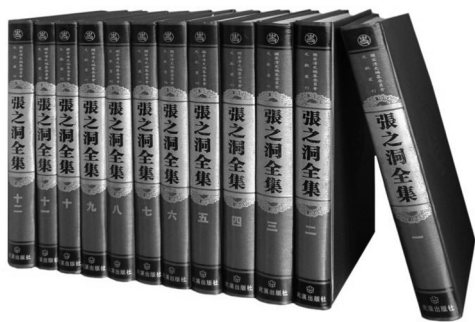
李杏华带领编辑团队投入编校工作，出版社在审稿编校、设计编排等方面精益求精的精神，以及服务编者的出色表现得到认可。2016年8月，6卷本《秦兆阳文集》面世。

《绿原文集》《邵荃麟全集》《秦兆阳文集》三套书，分别于2007年8月29日、2014年8月29日、2016年11月15日在北京举行出版座谈会，翟泰丰、李瑛、张炯、陈丹晨、白烨、格非、聂震宁、李敬泽等数十位北京文化名流参加，报刊也给予充分报道，极大提升了武汉出版社的影响力。三套书分别获得首届、第三届、第四届湖北省出版政府奖。汉版“近现代文化名人文集”，成为一个社会认可度较高的品牌。

重大文化工程推动名人文集再拓展

2014年起，省市相继启动重大文化工程建设，朱向梅董事长把“为城市立传”作为出版理念之一，出版社加快实施文化骨干工程，相继启动“汉冶萍档案文献整理”等重大项目。在普及读物方面，和市政协有关部门加强合作，极大提升“品读”系列的内涵和影响力。特别是近年启动的“武汉文脉”项目，与“荆楚文库”一道，直接推动汉版“近现代文化名人文集”自觉聚焦武汉文化、荆楚文化，使选题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最早配合国家重大文化工程的文集项目是《张之洞全集》，由著名中国经济史学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赵德馨教授主持编纂。经赵德馨、吴剑杰、冯天瑜、周秀鸾等专家学者历时20余年完成，2004年10月入选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清代文献重点工程项目。社领导决定不惜代价，将本已排版好的书稿按照文献工程的要求，改成竖排繁体字版重新编校。潘长胜带领编辑组仔细核



《张之洞全集》

查文献，克服竖排繁体字版带来的诸多困难，2007年通过验收，与会清史专家一致评定质量为优。2008年，《张之洞全集》出版，全书共12册、1275万字，收录文献14453件，比1928年底本《张文襄公全集》多7802件，比1998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张之洞全集》多3473件，是收录最全、编校较为精审的张之洞文集。“荆楚文库”“武汉文脉”实施后，这个项目自然入选。

近年来，一方面着手将已出版的文化名人文集按省市文化工程要求重新编排，争取入选；另一方面，围绕近现代湖北、武汉文化名人策划新的文集选题，近几年实施和正在编辑的有《废名全集》《黎元洪全集》《邹荻帆全集》《严文井文集》《欧阳山全集》等。

废名是中国现代作家、学者，湖北黄梅人，其作品集虽有2009年王风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废名集》，但收录不够完整。2017年初，我得知武汉大学陈教授在收集整理废名作品，就和杨建文等一起前往拜访。陈教授长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对闻一多、废名等研究尤深，他在编撰体例设计、文字校勘等方面的专业功力，使《废名全集》的学术和版本价值有了保证。杨建文带领人文中心的杨童舒等10位编辑，逐一对照底本，反复校对书稿，查阅大量资料，用可靠、可信的版本校勘原文和引文，最大

限度恢复作品原貌。2023年10月,10卷本《废名全集》出版,编者、编辑通力合作,打造了一部体例合理、收录完备、校勘审慎、印制精良的废名作品“新善本”。

《黎元洪全集》是在与萧致治、张笃勤两位学者交谈中产生的选题。萧致治的《黎元洪新传》拟在我社出版,张笃勤和冯天瑜合作出版了《辛亥首义史》,我们谈到辛亥首义人物大多出版了文集,如《孙中山全集》《黄兴全集》等,唯独作为辛亥首义重要人物的黎元洪没有编文集,两位学者表示愿意编。萧致治曾经主持《林则徐全集》的编纂,张笃勤对辛亥首义素有研究,我建议他们最好编全集,并向社领导作了汇报,社领导非常支持。编校团队负责人开始是齐大勇,后因工作变动由新调入的胡新负责,他带领蔡文华等一批年轻编辑核订底本,依照编纂体例核实、修改电文标题,依托专家力量仔细审定,于2025年底圆满完成全套12册的出版任务。

《邹荻帆全集》《严文井文集》等都是与“荆楚文库”“武汉文脉”衔接策划的选题。邹荻帆是中国当代诗人、翻译家,曾任《诗刊》主编;严文井是中国当代作家、儿童文学家,曾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邹荻帆是湖北天门人,严文井是湖北武汉人。2016年,一次在与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诗人邹建军交谈中,得知他与邹荻帆的儿子邹海岗、邹海仑熟悉,也很有兴趣担纲编纂《邹荻帆全集》,于是借北京开会之机,我与邹建军一起拜访邹荻帆亲属。后来几年中,邹建军



《废名全集》出版座谈会

带领弟子利用寒暑假到处查找资料,走访了不少图书馆,反复打磨体例分卷,弟子换了好几茬,仍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硬生生把原来预计的全集规模从8卷扩充到13卷。出版社编校队伍也经过几次调整,最后在杨建文、刘沁怡、管一凡等十余人的努力下,终于在2025年底出版。

我们最初也想为严文井出版全集,无奈另一家出版社介入,只好与严文井女儿严欣久商议,授予我们“荆楚文库”版权,由蔡文华负责编辑《严文井集》。同时,《欧阳山全集》也在实施中。

汉版“近现代文化名人文集”选题前后延续近40年,其间虽根据情况有所调整,但主体一直聚焦湖北籍或在湖北、武汉工作生活过的文化名家、历史名人。整理他们的著作,对于系统挖掘梳理乡邦文献,弘扬地方历史文化,夯实学术研究根基,创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地方出版品牌,培养和锻炼出版队伍,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邹德清,曾任武汉出版集团副总经理、武汉出版社总编辑,编审

普特融合教育，照亮孩子成长之路

◇ 覃 丽

人物名片：覃丽，民进会员，范德堡之家特殊教育机构创办人。

我出生于武汉，性格里带着武汉人天生的豪爽与敢闯敢拼。10岁那年，我离开家乡，远赴海外求学。那时的我并不知道，二十多年后，我会带着在世界各地积攒的一切，回到这片出发的土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建一所学校，再一点一点地，把“普特融合教育”从理想变成现实。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我一直是旁人眼中的“优等生”。10岁赴美读书，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被誉为“南方小哈佛”的美国范德堡大学，其特殊教育

专业在全美名列前茅，我也是这个专业唯一的亚裔学生。说实话，进课堂之前，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对“特殊教育”有些偏见，觉得就是一群“智力障碍、身体残疾的孩子”，偶尔献爱心可以，长期相处，怎么搞？

但教授在第一堂课上说的话，像一颗钉子楔进了我的脑子里：“今天坐在这个课堂里的你们，有的是你选择了特殊教育，有的是特殊教育选择了你。”毕业两年后，这句话忽然在我脑海里蹦出来。我觉得我是后者，我被赋予一种责任，要去帮助那些“不被看见、不被理解、甚至常常被误解”的群体。

走进专业我才发现，特殊教育分成13个大板块。除了功能性障碍、神经发育障碍，还有很多“边缘”的孩子——阿斯伯格综合



在华中师范大学培训特校骨干教师

征、多动症、社交情绪障碍、行为问题、心智发育迟缓……他们分散在普通学校里，被当成“坏孩子”“顽皮的孩子”，在专业里，我们统称为“融合教育”。

我逐渐打破了对这个群体的刻板印象，也改变了自己原有的认知。无论是什么障碍的孩子，只要给予正确的方法与支持，所有的孩子都是可教授、会学习成长的。儿童6岁前是黄金时期，早期干预是核心。

2012年大学毕业，怀着激动的心情，以及对非洲大草原的向往，我踏上了援非支教这条路，前往热情的西非——尼日利亚！

我在卡拉巴尔的一所小学当一年级班主任，班上30多个小朋友，黑皮肤、大眼睛，上课时闪亮地看着我，可爱极了。当地的教学条件很简陋，停电是常态，网络要靠自己买流量，下雨天动不动掉线一小时；水不能直接喝，买生活物资要在警卫保护下每周定时出行；疟疾等疾病像感冒一样寻常。

教具基本靠手工制作。我用废纸混着泥土捏了一个空心火山的形状，买来红色颜料和小苏打，给孩子们上演“火山爆发”。有个孩子特别内向，我和助教老师到他家家访，土建的房子，周围是高高的棕榈树和

橡胶树，家徒四壁，但又物产丰富。他妈妈是个裁缝，为了感谢我，用非洲布料给我做了一条裙子。家长和孩子之间那种最质朴的情感流动，打破了地域、种族、语言的差异。

在非洲，我第一次真切地懂得，不管肤色、不管背景，所有孩子都一样可爱，所有孩子都能被教好、被点亮。

结束非洲的一年工作，我被猎头挖到新加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注册的IB（国际文凭）世界学校工作了五年。这里汇聚了全世界最顶尖的教育专家，家长来自各国领馆和跨国集团管理层。

刚去时，我这个才毕业一年的愣头青，阅历、经验、工作节奏都跟不上。但正是这段经历，让我学会了“多学科、跨专业”的团队作战，练就了高效率的沟通技巧，奠定我在专业里发展的基石，也体验到了引导式教学的乐趣。老师不是输出的机器，要去挖掘孩子的天赋，引导他们主动学习、思考、创新。在玩中学，学中思考，思考中创新、成长。

见遍世界的好，我更想把最好的带回家，带回武汉，带回我出发的地方。

回到武汉，从零开始

2019年8月，我带着情怀、梦想和抱负回到家乡武汉。在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谢俊明董事长的支持下，范德堡之家儿童发展中心成立了。我们专注于为自闭症、语言发育迟缓、注意力不集中、多动、社交障碍和读写障碍的学龄前儿童提供早期干预服务。

开业前期，我花重金把国外的专家同事请到武汉，给老师们培训，给家长们开讲座。

湖北卫视来采访，一百多位家长来听讲座，那时梦想的种子在发芽。

然而半年不到，新冠肺炎疫情来了。招生骤减，运营陷入困难。国外教学模式水土不服、人员短缺、岗位专业能力参差不齐、教师培养周期长……一个个问题接踵而来。最难的时候，我整夜睡不着。但我的倔脾气上来了，只要学校里还有一个孩子，只要还有一个家长信任我，我就不能倒下。越是在困难时期，越不能降低服务品质。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无法正常营业，就转战到亚洲大酒店过渡。我们带着孩子们走进琴台音乐厅、商场、地铁、美术馆、农科院，做了大大小小 30 多场公益社会融合活动。我们的小朋友走在人群里，非常有秩序，也不会因为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失控。有的人知道他们是一群特殊孩子时非常惊讶，那是因为早期干预给了孩子们走进社会的钥匙，让他们看上去不那么“特殊”。这些孩子需要接触社会，更需要被社会看到。

有一次，我打开社交媒体，一位母亲的留言让我瞬间红了眼眶：“Leo 已经读二年级啦，他很喜欢阅读，而且现在非常非常自信。”Leo 是我教过的一个孤独症男孩，相识之初暴躁易怒、无法与人正常交流，如今已能安静阅读。无数个这样的瞬间，是支撑我走下去的全部动力。

人才短缺是这个行业面临的很现实的问题。我走访北大医疗，与北大医疗脑健康行为发展教研院达成战略合作，成为该院湖北独家合作单位，引进国际认证感统训练、跨学科 STEAM 课程及脑科学专注力项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西结合”课程体系。

北大医疗专家也定期来校督导，进一步提升了教学水平。

让融合教育在武汉生根

我面对的孩子，不光是传统意义上程度特别重的。阿斯伯格综合征、多动症、社交情绪障碍、心智发育迟缓的孩子，大量混迹在普通学校里。我们眼里的“坏孩子”“顽皮的孩子”，其实都可能需要额外的支持。

有教无类是我国传统教育理想，普特融合教育正是这一理念在当代的生动实践。普特融合不等于把特殊学生直接放进普通班级简单“混读”，它包含两层内涵：一方面保障特殊需要儿童平等享有就近入学的权利，在普通校园获得适合自身身心水平的教育、康复与社交机会；另一方面也让普通学生在共处中学会尊重差异、理解多元，塑造友善包容的品格，实现普特儿童双向滋养、双向赋能。

我积极推动融合教育在武汉的落地。联手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幼儿园开展“护苗天使”行动计划，对幼儿进行语言、行为、感统、情绪等方面一对一指导，这是融合教育在武



家长送来锦旗感谢



江岸区学前普特融合教育试点启动仪式合影

汉的首次大胆尝试，为特殊孩子的教育问题提供了新方向。

2024年，在我多方奔走下，与武汉市慈善总会合作设立专项基金，为江岸区融合教育提供了支持。2025年3月，在江岸区发改局、教育局、武汉市慈善总会等多部门统筹协调下，我和团队与滨江九悦幼儿园联合承担的江岸区学前普特融合教育试点项目正式启动。现在试点工作已经由一个园拓展到江岸区滨江系的四所幼儿园。

经过一年深耕，成效令人振奋：特需幼儿课堂主动参与率提升超60%，适配性任务完成率达82%，主动社交频次提升超50%，问题行为发生率下降72%，100%适应幼儿园一日集体生活，90%以上性格愈发开朗自信；普通幼儿在共融中涵养了关爱、包容的美好品格；全体教师融合教育技能达标率达100%，家长对教师工作满意度达100%。2025年12月，试点中期汇报会顺利举行，“江岸模式”获得各方高度肯定。

2025年，我以主旨发言嘉宾的身份出席中国（广西）-东盟国家特殊教育教师高质量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围绕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和AI赋能科技助残等议题分享中国经验。从一线教育实践者到代表中国智慧的国际发言者，我用专业与创新推动着行业进步。

2024年，我在华创会德国专场上签署协议，引进德国特教理念。德国特教起步早，不仅关注特殊教育，还形成培训特教人才、康复人才的成熟体系。我希望把国外新的科学教育方法持续带回国内。此外，我还持续开展线上线下科普讲座，帮助家长和普教教师了解特殊教育，并通过给地方两会建言献策等途径，提升社会对融合教育的认知。

国家已在“十五五”规划中将特殊教育、普特融合教育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期待武汉能够牢牢把握政策机遇，让顶层设计在本地落地生根。面对我市中小学、社会上大量特殊需要儿童的现实诉求，也期盼教育部门加快打通从学前到小学阶段普特融合教育链条，筑牢各层面制度政策保障。依托范德堡



省妇幼光谷院区成立医教融合试点工作

之家联合各校、机构探索沉淀下来的融合教育实践样本，也盼望着能够借助市政协提案的推力，把经过实践检验的经验推广开来，推动普特融合教育真正走进更多幼儿园与校园。

民进相伴一路不孤单

我与民进的缘分，早在创业初期就种下了。一次参加民进江岸区工委“用艺术点亮星星的孩子”公益活动，这个活动他们已坚持十多年。看着谭必如、尹闯、夏传涛等会员年复一年为“星星的孩子”默默奉献，我深受触动，郑重递交了入会申请。

2022年底，我正式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入会后，我不再只是一名特教老师，更成为特殊儿童群体的发声者。我连续多年积极参政议政，就特殊儿童教育问题建言献策。2024年，我以特邀界别（港澳台侨）身份参加了武汉市两会，并参加市领导座谈发言。

2024年10月，由民进武汉市委和中共江岸区委统战部主办的“学龄前儿童多样化发展报告会”举行，我与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的专家共同探讨融合教育的实践路径。同年11月，民进“同心润心”心理咨询江岸区（范德堡之家）工作站正式揭牌。我依托范德堡之家创立并建设该工作站，以严格、专业的评估与监督体系，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注入新的力量，也为民进的社会服务品牌增添了一抹亮色。

2026年4月，民进“同心润心·呵护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走进江岸区某小学。我携教师团队开展小学特殊需要学生识别与支持专题讲座，针对老师们在日常教学中遇到的特需学生教育困惑逐一解答。



和孩子们做互动游戏

从课堂到讲坛，从校园到社区，我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民进人的理想抱负——让每一个“星星的孩子”都被看见、被理解、被温柔以待。现在，我又在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读书，想系统性地学习公益企业的管理，如何搭建公益项目，如何与基金合作。

教育从来不是筛选优胜者的标尺，不是分出高低优劣的赛场，而是一场双向的滋养与成全。每一个孩子，无论带着怎样的差异来到世间，都拥有发光的权利。回国创业至今，我们已累计为100多名孩子提供干预服务，其中40%成功回归普通学校，融入集体生活。

前路依旧漫长，融合教育的种子还需要更多人一同浇灌。我仍会步履不停，带着民进人的初心与担当，继续奔走在校园、社区与讲坛之间。愿每一颗散落的星星，都不必独自闪烁；愿多元与包容蔚然成风，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自在、热烈地绽放属于他们的光芒。

田野上的旗帜

——嘉鱼县官桥村八组改革发展纪实

◇ 余 玮

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唤醒了广袤乡土，也改写了鄂南嘉鱼官桥八组的命运轨迹。40余载岁月更迭，这片曾经贫瘠的土地，从民众饥寒交迫的穷乡僻壤，蜕变为产业兴旺、文明富庶之地。两代人接力耕耘，于乡土之上写下一段不寻常的变迁史。

春水初生，分田到户活乡里

1978年冬，鄂南丘陵深处的嘉鱼县官桥镇官桥八队，人均年收入约50元，集体账上不仅无一分钱积累，反而欠了一万多元外债。

26岁的周宝生当时在县化肥厂工作，月定量36斤粮，算得上一个“铁饭碗”。那年春节前，厂里一名工人迟到，车间主任

当众训斥：“再这样，就罚你回农村去！”这句话像一根刺，扎进了周宝生心里。农村在这位车间主任眼里，是永世不得翻身的苦役之地。可周宝生不服，他想起自己曾劝父亲改一改吃大锅饭的老法子，却被父亲顶了回来。

转过年来开春，周宝生做出了一个令四邻愕然的决定：辞去化肥厂的差事，丢掉那只“铁饭碗”，回官桥八队当队长。父亲老泪纵横地劝阻：“伢，好歹在城里工作一个月有36斤粮，可以吃饱肚子哩！”周宝生只回了一句：“我就不信农村永远穷！”

上任没几天，周宝生从报纸上看到安徽凤阳联产承包的报道，连夜召集社员，把田地按好坏分类定产，承包给各家各户。驻队干部曾要求收回土地，周宝生坚持推行，顶



官桥村八组近景

住压力，掷地有声：“交足公粮，其余都是自己的。”当年全组粮食产量达到35万斤，比历史最好年份多出10多万斤，乡亲们终于一日三餐吃上了白米饭。

粮食丰足，并未让周宝生止步。1981年，这位出了名的“周大胆”又出一招，他拿着一份农民可以经商的红头文件，带着一帮农民“洗脚上田”，在官桥集镇租了三间房子，开起小卖部、熟食店和冰棒厂。一年下来，净赚7000元。

众乡亲头一回见着这许多钱，满心欢喜，指望商店、冰棒厂继续做大。这时，周宝生却宣布：店不开了，回家开矿、办厂。有人当面质问，他连开几次群众大会，说：

“官桥镇地方小，销量有限，加上我们开店后其他小店跟着来了，像这样‘五马共槽’，才真正是生意做不长。我们村的狗头山下有煤炭，不如趁早转舵，回去开矿。”

在不被理解的情况下，他拿出家中仅有的6000元积蓄，在村民代表会上说：“煤要挖，厂要办，赚了钱是公家的，赔了本算我私人的。”开煤窑期间，他带头下煤井，一次井架倒下，险些丧命。煤矿为组里带来200多万元收入，积累了100多万元资本。

此后，他率领八组人陆续办起砖瓦厂、铸造厂、钉丝厂、手套厂、家具厂、沙发厂、金属结构厂等10多家工业企业，每年利润都在100万元以上。

到1985年，村民已经过上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日子。此时组里

冒出两种声音：一是分光家业，各干各的；二是小富即安，怕上新项目赔老本。周宝生采取的办法是，适当提高村民生活水平，使人均收入略高于附近组，然后将大量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他以工业利润反哺农业，先后投资200多万元，将230亩望天收的农田改造成稳产高产的良田，并辟出1400亩杉树基地、250亩茶园基地。

远客初来，引智兴工通南北

1993年，官桥八组引进第一家高科技装备制造企业，却因外方提供淘汰设备，一分钱没赚到，反而交了一笔“学费”。周宝生没有气馁。这年春天，武汉冶金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刘业胜受朋友之邀来到官桥八组。这位全国第一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一直想让自己“永磁合金”的技术产业化，却屡屡受阻。

在官桥八组住了一段时间后，他被这里良好的环境和周宝生的诚挚所打动：“八组是干事业的地方。”周宝生察其意，问：“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得投多少？”答：“五六十万吧。”“一百万如何？”周宝生接着说，“您



2008年3月，周宝生（右）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

若不嫌弃，就来这里，要人给人，要钱给钱。您想怎么干，我配合，当后勤部长。”

三天后，刘业胜辞掉“铁饭碗”，来到八组。他拿出多年积攒的两万元作风险抵押金，周宝生执意不收：“你从大城市来到小山村，就是信得过我们，信任比金钱重要。”

就这样，湖北长江合金厂的牌子挂了起来。三个半月后，永磁合金投放市场，每年向国家上缴利税1000万元。后来，永磁合金被授予“国家科技成果一等奖”，产品广泛应用于军工民用，远销德国、瑞士等国家和地区，用该产品制作的精密仪器还用到了“神舟二号”飞船上。

合金厂站稳脚跟后，周宝生又推平一座荒山，盖起四万平方米的厂房，建成“高科技工业园”。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两纵两横”“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跨江过河，他敏锐捕捉到商机，立马办起缆索厂。为论证项目可行性，他与有关部门同志远赴上海考察，累了就在车上打个盹，饿了就在路边小店扒几口饭。

“田野”牌桥用缆索日后被列为“国家重点技术创新项目”“国家重点新产品”，应用于武汉白沙洲长江大桥、荆州长江大桥、军山长江大桥和缅甸玛哈邦多拉大桥等国内外多座大桥。

如今，官桥八组制定了自己的发展蓝图：

做强博士后高科技工业园区。依托钎钢钎具、无缝钢管、桥用缆索等高科技企业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院士专家工作站等科研机构，突出金属制品研发生产、应

用展示、孵化、服务、仓储五大功能，打造金属制品产业聚集区。

做精景观农业示范区。在已建思源广场、发展广场、农博馆、现代农业示范园和文昌塔、乾坤阁、风清楼等景点基础上，实施“十里八村”“芳园百里”“梦里水乡”等项目，推进梁家湾民俗文化村、红旗茶厂野奢酒店、茶博馆等项目建设，做实4A旅游景区。

做大特色旅游休闲区。项目占地面积约2776亩，计划投资3.2亿元，建设乐活度假区、休闲游乐区、田园艺术区三个板块，主要建设小黑牧场、奇迹空间、童梦稻田、飞鱼部落、蛋壳营地、四季花园、主题商业街、游客中心、生态停车场等50余个子项目。

做实运动康体颐养区。蓝城·春风田野小镇项目紧邻官桥村八组旅游区及嘉鱼大学城、新材料小镇，拟打造武汉都市圈高端颐养度假标杆、农业多产融合示范基地。官桥八组人提出“三百目标”：创百亿村庄、做百年企业、树百年商誉，计划到2035年

实现资产 100 亿元、收入 100 亿元、利税 10 亿元、村民年人均纯收入 15 万元。

书声初起，办学在乡育新人

2002 年 11 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周宝生作为代表在人民大会堂聆听报告。“深化教育改革”“鼓励社会力量办学”“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等句，令他心潮起伏。他想起自己未曾上过大学的遗憾，想起农村孩子升学之难，也想起大学生下乡之难。同年 12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通过。次年 6 月，教育部时任部长周济在独立学院工作会议上强调大力发展民办教育。

周宝生决意“试水”教育。此时武汉大学正推进改制，拟引入企业合办东湖分校。周宝生知悉后十分动心：武大百年名校，合作基础深厚。东湖分校前身为 1998 年设立的武汉大学职业技术学院，2000 年 8 月成为教育部首批批准的 4 所独立学院之一。

经过多次考察和咨询，田野集团开始与武汉大学接触。此前已有多家企业商谈联合办学，最终武汉大学选择与田野集团、武汉弘博集团合作，2003 年 7 月 18 日签订共建协议，田野集团占股 65%。同年 8 月，田野集团在武汉市江夏区大桥新区征地 1500 亩，总投资 11.2 亿元，开始建设独立新校园。12 月初打下第一根桩，40 多个建筑队同时开工。校园建设瞄准国内一流，聘请华南理工大学规划设计院担纲、建筑大师何镜堂院士领衔设计。

2004 年 9 月，武汉大学东湖分校整体迁入新校区，2004 级新生成为首批进驻学生。这年招生，本科分数线高出投档线 50 多分，淘汰填报该校志愿考生数千人。8 个月建好美丽而广阔的新校园，在校学生达到万余人——“东湖奇迹”展现了民间资本的活力。

办学定位上，周宝生不照搬武汉大学模式。母体高校要建成研究型国际化一流大学，东湖分校招收的是三类本科考生，必须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主。学校确立“一体两翼”人才培养目标：思想政治、专业知识、文化修养和身体心理素质为“一体”，职业技能、创业能力为“两翼”。

2009 年 5 月，弘博集团退出，田野集团独立与武汉大学联合办学。但周宝生始终感觉独立学院身份尴尬，像游走在公办与民办之间的夹心层。他盘算着“单飞”，认为真正“独立”是学校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2011 年 5 月 29 日，原武汉大学东湖分校举行揭牌盛典，正式更名为“武汉东湖学院”。此后正式脱离母体，成为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本科学校。

随着武汉东湖学院办学规模扩大，武汉校区的一些基本办学条件指标无法满足教育主管部门要求，校园占地面积和校舍建筑



武汉东湖学院嘉鱼校区鸟瞰图

面积严重制约发展。周宝生提议：把大学办到家门口。通过教育为家乡培育人才，带动乡村振兴，这不正是八组办学的初衷吗？嘉鱼县紧邻武汉，与武汉校区仅40分钟车程，未来可以承接武汉市资源外溢。

2019年10月

31日，武汉东湖学院嘉鱼教学改革基地（南校区）投资签约仪式举行。2020年10月，校区一期工程顺利开工。此时海归博士、周宝生之子周志专接棒主事。为确保新校区如期建成投入使用，周志专与同事们夜以继日，抓质量、抢进度。他坚持博采众长，带队前往国内外著名高校考察学习，充分借鉴比利时鲁汶大学融合式办学理念，聘请多家专业设计团队，结合嘉鱼实际精心设计总体规划，经数十次打磨修改，最终落定校园规划。

2022年9月16日，嘉鱼教学改革基地落成庆典暨新生开学典礼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余名大一新生，成为首批入驻的大学生。整个嘉鱼校区，教学楼、实验大楼、学生公寓、体育馆、图书馆、校医院、学术交流中心等一应俱全，设施一流。基地依托武汉东湖学院乡村振兴学院，开设农业技术、文化旅游、健康护理等专业，培养、培训乡村振兴技能型人才。

办学之事，渐成人才归聚之势。周宇桥是土生土长的八组人，2023年初回到家乡，在南校区谋得一份辅导员的差事，带着四个班152个学生。对她而言，南校区的待遇在



建成18片网球场馆迎接全国性赛事

本地已属优厚，环境又安静舒适，家门口就有这样的机会，便没有远行的理由。

南校区的园艺清洁、水电维修、宿舍管理等配套岗位，优先聘用周边群众，提供就业岗位2300多个。基地还努力推进产教融合、产学研融合，培育引导文旅、康养、现代农业、现代商贸服务业等新兴业态，助推嘉鱼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做优东湖学院南校区，在新建可容纳3万名学生校区的基础上，拟接续谋划新的教育项目。规划建设容纳2万名学生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配套建设古风艺术馆、高尔夫训练基地、高标准游泳馆、武术馆、小球馆等设施。学院建设的双拍运动中心，是高标准球类综合运动基地，包括1000座网球中心赛场及10片室外网球场、300座匹克球中心赛场及16片匹克球场。

规矩初立，以文化人树新风

早年的官桥八组民风散漫，摸牌赌博、小偷小摸、打架骂人、虐待老人、垃圾遍地之事时有发生。周宝生深知，文明程度提高，得靠制度。

1982年开始，八组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员工代表大会等程序，陆续制订了一系列组规民约。猪、鸡、鸭、鹅必须圈养，放出一次处以罚款；禁止摸牌赌博，一经发现予以罚款；老人去世，不准土葬。近年来，规章制度已延伸到生产、生活、经营、学习、管理、勤政廉洁、党务工作等各个方面，形成完整制度体系。

1982年，八组招待所一台彩电被盗。有人劝周宝生算了，一台彩电不过两千元，继续查下去可能得不偿失。周宝生却认为，社会治安问题容不得半点松懈，必须一查到底。最终破案，花费远超彩电价值，但换来的是八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淳朴民风。

有一次，官桥村八组所属的田野集团从武汉请来三名技术人员。他们明知组里不准打牌是铁的纪律，却晚上悄悄溜到组外打麻将，被派出所逮住。他们打电话给周宝生求情，周宝生没有答应。事后他说：当时心里也很矛盾，人家是我请来的技术人员，如果照章处罚，撕破了脸面，就不大可能继续在八组待下去，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但是，如果宽容一次，那八组好不容易开创出来的一方净土就会受到污染。抓精神文明建设守土有责，要理直气壮。绝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

1989年起，周宝生高起点设计建起农民文化中心。卡拉OK比赛、篮球比赛、逢年过节的歌咏大会、文艺晚会搞得热热闹闹。常年开办农民夜校、农民训练班，开展



2023年9月28日雷锋文史馆揭幕

科技文化知识竞赛。周宝生自己也没放松学习，自学完成研究生课程，取得法学硕士学位与研究员职称，成为高级经济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工程技术专家。

每天早晨6点25分，村庄上空军号嘹亮。村民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是“号吹而作、号吹而息”。初来乍到的人，还以为这偏远的地方是一座军营。

2023年9月28日，武汉东湖学院雷锋文史馆在嘉鱼教学改革基地图书馆正式开馆。这是全国首家以雷锋为主题的文史类博物馆。展馆面积约1300平方米，主体展区分“序”“史”“文”“魂”“范”“跋”六大主题板块。序厅中央陈列着2.2米高的雷锋雕像，象征雷锋22岁的红色生涯。雕像身后是立体浮雕墙，镌刻着毛泽东主席在武汉东湖宾馆翻阅有关雷锋报道的《解放军画报》的场景，及雷锋驻足武汉长江大桥桥头堡的情景。

雷锋文史馆中的“史”板块通过历史照片、手稿文献及绿皮火车场景复原，还原雷锋在鞍钢、部队的工作生活细节；“文”板

块从诗文、才艺、影视等视角，进一步了解雷锋；“魂”板块通过“6+1”生动诠释雷锋精神；“范”板块展示一代代“追锋者”的身影，设置AI数字人互动装置，可语音问答雷锋事迹，并推出卡通形象大使“雷新锋”“雷先锋”。

雷锋文史馆对社会免费开放，成为周边中小学进行实践研学的第二课堂。馆内还开设“红领巾课堂”，结合思政课程设计拼图游戏、角色扮演等沉浸式学习模块，成为青少年教育基地。校方将其定位为“南湘北辽中轴线上的研学基地”，与抚顺雷锋纪念馆、长沙雷锋纪念馆形成区域联动。

灯火初上，老幼皆安岁丰和

如今的官桥八组，占地3.8平方公里。村民福利保障体系完善，为每户统一规划、设计、建造的别墅式村民新村，统一配置家用电器、家具；全体村民参加社会保险，退休村民每月领取3000元养老金且逐年递增100元；村民治病在医保报销基础上实行百分之百报销；小孩从出生到高中毕业，组里按月发给补助1000元；考取大学、与田野集团签订定向培养协议的，按照大专每年1.5万元、本科每年2万元、研究生每年2.5万元标准发给教育、生活费补助，毕业后优先安排工作并享有集团股份；村民使用水、电、天然气和订阅报刊，集团按发生费用的百分之五十给予补助。

让乡亲们过上城里人羡慕的生活，让八组的发展成果尽可能多地惠及周边父老乡亲。这是周宝生的毕生追求，也是全体田野人的初心和使命。

官桥八组的别墅群整齐排列，田野集团的车间里机器轰鸣，连片的油茶基地绿意盎

然。田野乡村公园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游人如织。这个仅67户247人的村民小组，靠着党委“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党建引领，集体总资产达70亿元，村民年人均纯收入超过10万元，带动周边村组共同富裕，勾勒出一幅“党建红”引领“共富景”的乡村新画卷。

企业车间里，红色的党员示范岗标牌在机器旁格外醒目。企业办到哪儿，党支部就建到哪儿。全组设立四个党支部，90多名党员分布在集团各个子公司，关键岗位上党员占了九成以上，形成“车间有党小组、项目有党员带头”的局面。

校园里的读书声，与车间里的机器声形成和谐共鸣。武汉东湖学院现有专兼职教师1300多人，高级职称教师占比近五成，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教师占比96%，设有11个教学院（部）、本科招生专业45个、专科招生专业33个，拥有2个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12个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电子商务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农”字招牌愈发闪亮。

远处，文昌塔巍然屹立。登塔俯瞰，全组美景尽收眼底：前有绿树摇曳、绿草铺地，后有森林公园环抱，户户过着殷实而富足、文明而幽雅的生活。当年落后的小村庄，已变成融现代工业、农业和教育、旅游业多元发展于一体的田野集团。

余玮，武汉东湖学院特聘教授、雷锋文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共青团中央《中华儿女》首席记者、中国作协会员

行而不辍：教育视域的三次跃升

◇ 刘清旭

人物名片：刘清旭，黄陂区政协委员，正高级教师，黄陂区教研室副主任、高中语文教研员。

教育这条路，走着走着，已过三十三载。回望来路，我从一名普通的语文教师和班主任起步，辗转于讲台、教研室，后来又多了民盟和政协的身份——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一颗想为教育做点实事的初心。

上下求索，只为学生成长

1993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一所教育基础相对薄弱的高中任教。说实话，当时学

校条件确实简陋，但年轻人身上总有股使不完的劲儿，把全部心思都扑在了教学上。我那时没别的嗜好，课余时间几乎全泡在钻研教育学、教材教法里。一堂课，上好了能高兴一整天，上砸了便翻来覆去睡不着，反复琢磨哪里出了岔子。怕自己底子不够，我又把大学专业教材翻出来重读，还从紧巴巴的工资里抠出钱来买书，不大的宿舍很快堆得满满当当。

我喜欢往学生堆里扎，听他们聊学习的难处、成长的烦恼。他们提的问题，能当场解决的，我立即解答；不能当场解决的，便回到陋室查阅资料，认真研究，直至给出准确答复。三年下来，我所教班级的语



2026年7月，参加由杭州“铭师堂”举办的“数智赋能县中振兴 深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论坛

文高考成绩名列前茅，在全校引起不小的轰动。不仅是教学工作，班主任工作也广受好评。当班主任，我信奉一条：不管什么家境、什么天分的孩子，都得一样对待；谁有困难，我就伸手帮一把。那时工资不高，常有家境差的学生来借钱，我也从不记账，借了就借了，在我心里孩子们能安心读书，比什么都强。

有个冬夜，学生在上晚自习，我们班顶楼一间女生宿舍的窗户被风刮破了。天寒地冻，不赶紧堵上，孩子们非冻病不可。我连忙找来锤子、钉子、牛皮纸，爬上楼顶，趁她们还没回宿舍，哆哆嗦嗦地把窗户钉严实了。多年后学生聚会提起这事，眼眶还红红的，其实我早忘了，但没想到她们都还记在心中。

2000年，我考至黄陂一中任教，笔试和综合考评都是第一。刚到新学校那一年，我在全校和全区开了六场大型公开课。我的课堂习惯以学生为中心，带着他们思考，启发他们自己悟，每场都坐得满满当当，同行们反响热烈，评价不错。2001年，学

校让我当了语文教研组长——那会儿我是学校历史上最年轻的教研组长。但我心里清楚，这点成绩不算什么，该下的笨功夫一样不能少。备课、带班、搞教研，每个角色我都尽力去演好，不敢敷衍。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业务精进，我的教育视野也不断拓展，对教育的思考也愈加深刻。在黄陂一中工作期间，我

先后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教育教学研究文章四十余篇，主持国家级课题研究四个并顺利结题，所带班级先后被评为区级、市级先进班集体，先后有五名学生考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有人说，教育是静待花开；有人说，教育是推动唤醒；有人说，教育是双向奔赴。我认为，无论以何种方式践行教育，教育者都应始终关注学生的学业进步与健康成长，将成才与成人有机统一，为学生的长远发展和健康发展奠基。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要让学生获得理解世界的多元视角，正如我从薄弱高中到黄陂一中的跨越，角色的转换使我不断深化对教育的理解，也让我的教育视域日益拓宽。

由己及人，共筑教研生态

2012年，因工作需要，组织调任我至黄陂区教研室，主持全区的高中语文教研工作。由于难舍耕耘多年的讲台，在2012年至2014年的两年时间，我同时承担着教研



2025年12月，在黄陂六中开展听课、评课活动，指导课堂教学

员与一线教学的双重任务，直至2014年才全身心投入全区高中语文教研工作。

教师的专业思想与专业能力，是学生学业进步的重要前提。为此，我经常深入教学一线听课、议课、评课。十余年来，我每年听课均在80节以上，多时逾100节。每听完一节课，我都组织全组教师认真研讨，既肯定成功之处，也指出改进方向，尽力帮助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端正教育思想、提升教学艺术、改进教学行为。在我的持续推动下，我区语文教师的教学理念日益先进，教学能力和综合素养显著提升。喻卉、姜静、朱艳玲、李琴、杨冰、詹玉婷、余桂君、吴娜等一大批教师先后获得区级、市级、省级优质课一等奖；涂莹、吴文焕、刘颖、余世源等十余名教师先后获得武汉市五项技能竞赛一、二、三等奖；杨建国、陈长海等二十余位教师先后被评为区级、市级优秀青年教师或学科带头人。

2019年，我被任命为教研室副主任，分管高中工作，同时继续兼任高中语文教研员。我经常带领高中教研员团队深入学校视导，对备、教、改、导、考、析、评、

研等教学环节进行深入调研，并给予针对性指导与反馈。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各校教育教学行为日趋规范，教学质量显著提高。每逢全区或全市性大型考试，我都动手撰写质量分析报告，每年累计十余万字。报告紧扣内容时代形势与国家政策，精准把握高考动向，从数据呈现、分析到备考建议，层层

深入，成为各校备考与教学的重要指南。这些年，黄陂区高考成绩一年上一个台阶，我心里也跟着高兴。

蔡元培先生曾说：“教育者，非为既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教研工作正是着眼未来的事业——帮助年轻教师成长，就是为教育的明天播下种子。每一次听课、评课，每一份质量分析报告，都是在为教育的未来铺路。从学校到教研室，我以两个不同岗位服务教育，也以两种不同视角审视教育，这使我获得了更客观、更全面的认知，为更好地服务教育提供了坚实支撑。

心怀大局，不负盟员使命

2012年5月，我加入民盟；2015年，当选民盟黄陂区工委委员、教育支部主委；2021年，又成为黄陂区政协委员。新角色意味着更多责任，我由此开启双岗建功。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合理安排时间，积极参加民主党派和政协的各项活动。

作为民盟黄陂区工委教育支部主委，我每年都积极响应民盟武汉市委的“烛光行



2025年1月，在民盟黄陂区工委“烛光行动”中，到盘龙城二中讲授唐宋诗词欣赏课

动”，带领支部盟员前往农村偏远学校送教，自己也上台讲课。迄今为止，我已在姚集小学、长堰小学、塔耳中学、蔡榨中学、盘龙城二中等十余所学校讲授唐宋诗词欣赏课。课堂中我结合孩子们的年龄特点，把传统文化讲得浅显有趣，孩子们听得入迷，老师也说了有收获，这些比什么表扬都受用。

我还经常参加市区两级政协组织的各类学习活动，不仅加深了对参政议政、履职尽责的理解，也增强了对国家政策和世界形势的把握。针对教育及民生的热点问题，如“双减”、全民阅读、“湖北省农村寄宿制学校发展教联体”建设、幼小衔接、小初衔接、初高衔接等，区政协组织政协委员进行了调研。我全程认真参与，并就“双减”等问题撰写调研报告，为行政部门决策和实施提出宝贵意见，受到区政协的高度评价。

一线教育教学的经历，让我以实干与情怀孕育了一片绿荫；教研室的工作，使我助力教师和学校沿着正确方向前行；民主党派和政协委员的履职，则让我深入开展社情民意收集，投身参政议政工作。每一次前行都让我的教育视域不断扩大，对教育的理解也更加多维和深刻。

我很喜欢塔拉·韦斯特弗在《你当像

鸟飞往你的山》里的那句话：“教育意味着获得不同的视角，理解不同的人、经历和历史……教育应该是思想的拓展，同理心的深化，视野的开阔。”作为一个教育人，能在这三个层面深度介入，获得立体的认知，并尽一份绵薄之力，确实是难得的幸运。

多年来，我先后荣获全国优秀语文教师、武汉市学科带头人、民盟武汉市委员会先进个人等称号。2024年，被聘为武汉市人民政府督学；2025年，获评正高级教师。这些荣誉，既是数十年辛勤耕耘水到渠成的结果，也是对我工作的莫大肯定。

教育之路漫漫，我愿一直走下去，踏踏实实，不急不躁。

从英伦到江城：一个海归的“跨界”之旅

◇ 卢永雄

人物名片：卢永雄，湖北通城人，西红柿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创始人，武汉工程大学教授，武汉工程大学侨联副主席，正高级工程师。

幕阜山走出的农家娃

我生在湖北通城，这里地处湘鄂赣交界的幕阜山区。小时候家里条件一般，村里谁家出了个大学生，是整个家族的荣耀。读高中时，受陈景润、“三钱”等科学家和老师的影响，我萌生了科技报国的念头。那时国家正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我觉得这会是未来的方向，于是报考了武汉大学物理系应用物理专业。

1999年武大毕业，我到复旦大学读研，在光科学与工程系纳米磁学专业主攻低维磁学；2002年又远赴英国约克大学电子系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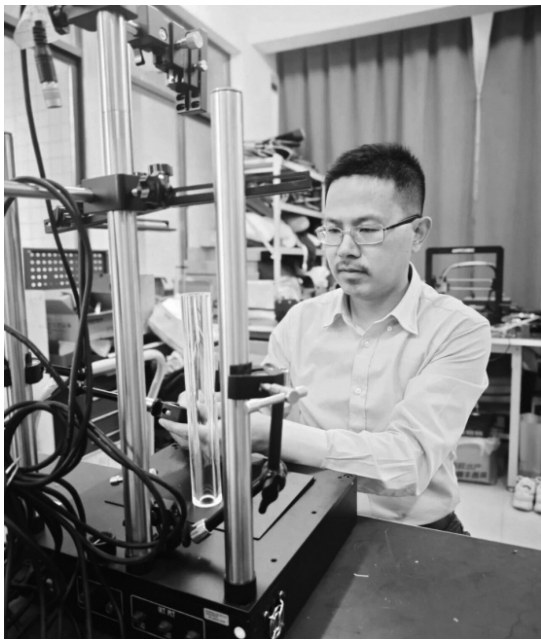
读自旋电子学博士，2005年获得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后，我进入全球领先的数据存储提供商——英国希捷公司研发部，从事磁传感器和纳米制造研究，屡获杰出员工奖、优秀员工奖，并升任主任工程师（Staff Engineer）。

在外人眼里，这是标准的“理想生活”：发达国家求学、安家，在全球知名高科技企业从事研发，稳定晋升，手里还有绿卡。可恰恰是这种生活，把我拖进了长达数年的“中年危机”。

实验室里听《歌唱二小放牛郎》

在希捷，公司规定每周工作39小时，我却长期干到60小时以上，一个人能干3个人的活。同事们热衷于计划周末去哪儿度假，我心里却总像有一团火在烧。



实验中的卢永雄

2006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实验室里空旷无人，我循环播放着中文歌。当《歌唱二小放牛郎》的旋律响起，“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我忽然停下了手里的活儿，眼泪夺眶而出。

那一刻我明白：无论走多远，我的根始终在中国。那个农家娃出身的通城少年，那个在武大、复旦、约克大学一路苦读的学子，那个在希捷实验室里挥汗如雨的工程师——他的归宿，不在泰晤士河畔，而在长江汉水之间。

后来我专门去过河北涞源的王二小家乡，还和西柏坡的老区人民、王二小当年的小伙伴合影留念。那张照片我一直珍藏。它提醒我：走得越远，越知道家的好；站得越高，越明白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2013年，国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如火如荼，国家出台多份文件促进创新创业。一天夜里，我又一次失眠，终于忍不住对妻子说：“我想回国创业。”妻子只答了一个字：“好。”

为什么是武汉

去哪儿？有同伴拉我去香港、上海。但我更看好武汉——九省通衢，高校云集，人才辈出，离老家通城也近。更重要的是，光谷这片热土，充满了“敢为人先”的气场。

2014年4月，我和创业伙伴在光谷注册了西红柿科技（武汉）有限公司。“西红柿”这个名字，红红火火，象征着顽强的生命力——它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雨露就扎根。

创业头几年，几乎零收入。父母要看病，两个孩子要重新适应国内的教育，全家压力巨大。但神奇的是，我的失眠症不药而愈。奋斗，是最好的安眠药。

太仓特检院的第一单

公司成立后，我们主攻智慧感知——通俗讲，就是用先进的磁传感技术，给工业设备做“CT体检”。

化工储罐一旦从底部腐蚀穿孔泄漏，往往不易察觉，但又容易引起爆炸，后果不堪设想。以前这类检测设备全靠进口，一套半人高的机器要价120万元，技术还不对我们公开。我决定用自己在英国希捷积累的纳米磁学、自旋电子学功底，跨界“降维打击”。

我们的第一个客户，是太仓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2015年，他们采购了我们自主研发的磁记忆检测仪。当时国产设备尚在起步，太仓特检院敢于吃螃蟹，看重的是我们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这份信任，让“西红柿”这块牌子，在无损检测行业撕开了一道口子，让我们在行业里站稳了脚跟。



测试现场

至今，我们和太仓特检院依然保持着紧密合作。从第一单开始，他们见证了西红柿科技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全过程。

用“小磁铁”撬动大市场

随后的几年，是公司技术与品牌的爆发期。我们将微小磁场探测技术首次改进并引入智慧感知领域，研发的储罐底板漏磁检测系统，体积最小的可手持，价格只有进口的一半，灵敏度反而更高。在2019年远东无损检测新技术论坛的“擂台赛”上，我们的设备一举击败进口产品，拿下“锐器奖”，并获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湖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目前，我们的产品已占据国内约80%的市场，实现了真正的国产替代。

更大的挑战来自地下。湖北拥有大量磷矿，但在开采中存在“岩爆”安全难题——矿山巷道边上的围岩因受力不均，极易产生爆炸。兴发集团某矿段总工反馈：我们的手持式岩爆检测仪，在井下能快速探测出岩爆风险区，就像给我们戴了一副眼镜，可以直观地看到危险区域，在井下不再像盲人摸象了，这为我们井下安全防护指明了方向。

这款仪器目前已在全国多处矿山投入使用。每当我想起那些在数百米地层下挥汗如雨的矿工兄弟，因为这副“眼镜”而多了一份安全保障，我就觉得回国这一趟，值了！

走进了武汉工程大学

2019年，我做了一个让不少商界朋友意外的决定：加入武汉工程大学，担任特聘教授。

为什么？因为我热爱教学。创业让我验证了技术，但我更想“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这件事，系统地做下去。

进校园后，我主讲《微电子制造原理》《人工智能新技术及应用》《先进传感技术》等课程，2021—2022年度获评学校“百佳导师”。我带学生下矿井、进储罐、钻隧道。矿井下又热又潮湿，但学生们大开眼界。实验室公众号上，学生执笔的推文写道：同学们的研究成果出现在隧道中、矿洞内、山头上，成就感拉满……

我常对学生说一句话：“做出来的东西要有人用。”大学师生不能在象牙塔里关起门来做学问，一定要走出实验室，走进社会，了解生产经营中的实际需求。在产学研用之间形成正反馈，做学问才更有成就感，才能走得更远。

我带的学生，有的考进来时分数并不高，但经过培养能够“低进高出”，这就是老师最大的成就感。学生都有自我的内驱力，你把他的内驱力唤醒了，他就能够做很多事情。

管理之道不在于管，而在于唤醒。无论是企业里的研发人员，还是课堂上的学生，激发内驱力，胜过一千条规章制度。

侨联副主席：架起归侨与故土的桥

作为武汉工程大学侨联副主席，我深知归侨群体的特殊价值——他们既是“桥”，也是“窗”。

2024年春节前夕，湖北省侨联领导侯继文看望慰问在汉归侨侨眷，来到武汉工程大学专程看望我这位英国归侨，详细了解我的归国创业经历，对我取得的科研成果表示赞赏。这份关怀，让我更加坚定：归侨不是“局外人”，而是武汉这座城市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力量。

我常以自身经历告诉年轻的归国学者：出国是一种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只有远渡重洋，你才真正懂得长江黄河的分量；只有离开故土，你才真正明白为何而归来。

我所认识的“智慧感知”行业

十几年摸爬滚打，我对所在的智慧感知与无损检测行业，有三点判断：

第一，国产替代不是“低价替代”，而是“技术超越”。我们之所以能拿下80%的市场，不是因为我们便宜，而是因为我们手持式的产品比进口的机器更好用。创新是企业唯一的生命线。

第二，中西差距在工业检测的“最后一米”。国外设备往往“高大上”但不接地气，不适合中国工厂、中国矿井的实际工况。中国人的问题，最终要靠中国人自己解决。

第三，产学研用是必由之路。高校有人才、有理论；企业有场景、有资金；用户



2026年，中国致公党武汉工程大学支部成立（右六卢永雄）

有真问题。三者打通，才能形成正反馈。这也是我为何既要办企业、又要进高校的根本原因。

回望与展望

回首这十余年，我从一个在英国实验室里听《歌唱二小放牛郎》流泪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带着学生在矿井下挥汗如雨的教授。我的人生轨迹，恰好印证了那句话，“回国是一种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武汉这座城市，给了我太多：光谷的创业生态、武汉工程大学的讲台、侨联的大家庭、兴发集团的矿井、太仓特检院的信任……它不像某些一线城市那样高高在上，而是实实在在地为创业者提供土壤。真实、友好、文明、进步，这就是武汉的魅力。

未来，我愿继续做三件事：用“智慧感知”守护工业安全，让每一座储罐、每一座矿井、每一座桥梁，都有一双“安全的眼睛”；培养出更多“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学生；作为侨联副主席，为归国学者与武汉这座城市之间，架起更多座桥。

冯玉祥创办汉口三户图书印刷社

◇ 李亚南

抗战将领冯玉祥同时是一位积极的文化抗战者，他主张以文化为武器，提升军民的抗日热情，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在武汉期间，他参与各种文化抗战活动，还在汉口创办了三户图书印刷社。湖北省图书馆保存有诸多该印刷社出版的书刊，这些书刊是抗日战争时期武汉文化抗战的重要体现。本文以这些书刊为基础，结合冯玉祥的日记和当时的报刊资料，追忆三户图书印刷社的历史。

文化抗战 唤醒国人

1937年11月，冯玉祥从南京来到武汉。这时的武汉已经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众多

文化人士聚集在这里，探讨如何抗日救亡。冯玉祥也与这里的文化人士交往密切，他在日记中频繁记录了与王向辰、老舍、何容、吴组缃、赵望云等人在其武昌福音堂住所共商抗日宣传的情景。

1938年1月，在冯玉祥的支持下，王向辰、何容主编的《抗到底》和赵望云主编的《抗战画刊》创刊于武昌。为了方便印刷这两种刊物，冯玉祥、王向辰、老舍、何容、王德宽、李连城等人开始筹设印刷社，当月购买好了印刷机。印刷社的地点最终选在汉口统一街25号，取名为“三户图书印刷社”。取名“三户”的缘由，冯玉祥援引“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典故，意在表明：日本军国主义欺凌中国，即便中国只有三户人家，



冯玉祥

也终将战胜日本。因此，“三户”之名体现了冯玉祥抗战必胜的信念。

三户图书印刷社的创办，还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冯玉祥是一位坚定的抗战者，他多次在日记中表达“我们唯有抗日方是救国之道”。1937年1月1日，他写道：“我是抱定为国而死的，我是抱定为抗日而死的，不为国不为公必定都作亡国奴，不抗日不拼命一定作日本人的奴隶，我盼望全国同胞认定此理而行，不团结不能抗日，不严于自责不能团结，希望同胞们认定此理而行。”2月11日，他自责地表达了对失地未复的痛心和焦急，他写道：“失地五、六年尚未收复，我是活人呢，是死人呢，是活人为什么不去收复失地；是死人又为什么糟蹋世上的粮食呢？不能收复失地，还不如死了好一点呢。”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内部的求和之声甚嚣尘上。1937年12月5日，冯玉祥写道：“日前国防参议会开会，辩论和战之事甚烈，

主战诸人甚至拍桌怒目，故将有不能开之势”，其中汪精卫和邵力子的主和声音最大，“邵力子召集宣传工作人员讲话，明白宣示中国不能再战，甚愿接受和平调解”。主和声音让冯玉祥倍感焦急，他清楚在这个关键时刻，任何一丝动摇都可能葬送民族的未来。

另外，冯玉祥对国内抗日宣传的不足深感不满，忧虑国人缺乏危机意识，这种情绪在他的日记中有多次体现。1937年1月18日，他写道：“国家快亡了，大家没有觉悟，仍旧。民族将全作奴隶了，大家也不发急。”2月1日，他再次写道：“大家刻刻不忘四省多的土地，三千五百万父老兄弟，作了亡国奴，我们要拼命报国，万不可缓了。”当时国内教育中缺乏抗战救国的内容，冯玉祥认为这与国家危难的现实严重脱节。11月22日，他感慨道：“国家已至若斯严重关头，而儿童所念课本，一无雪耻救国，明耻教战思想，而尚管秋虫叫不叫，月亮明不明。中国教育之整个破产，可怜亦复可叹。”

为了改变上述状况，冯玉祥决心通过创办印刷社，出版宣传文化抗战的书刊来唤醒国人。他推动设立三户图书印刷社，为文化人士提供了一个宣传抗日思想的平台。冯玉祥也充分利用该平台，出版了诸多自己的著作。然而，随着日军侵略的加剧，1938年7月，三户图书印刷社被迫从武汉迁往桂林，仅仅运营数月。10月27日，冯玉祥也离开了武汉。

率先著书 激发民众

在武汉期间，三户图书印刷社出版了诸多宣传抗战的书刊，包括《抗到底》《抗战画刊》《抗日三字经》《保卫武汉》《诗



三户图书印刷社出版的《抗日三字经》

歌近作集》《抗战诗歌集》《抗日的伟大民众》《抗日的模范军人》《不忘国仇问答》《倭寇内部的危机》《日本对在华外人之暴行》。笔者按照书刊的出版时间顺序，简要介绍它们的主要内容。

《抗到底》：1938年元旦创刊于武昌，半月刊。主要撰稿人包括冯玉祥、老舍、何容、王向辰、赵望云、吴组缃等知名人士。他们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强化民众的抗日决心。该刊发刊词指出：“在艰苦的抗战期间，不许任何人作任何无益于抗战的事情。我们所有的枪杆既已都对准敌人的心窝，自然我们所有的笔杆也必须都扑向敌人的咽喉。”

《抗战画刊》：1938年1月创刊于武昌，月刊。特约撰稿人包括冯玉祥、老舍、田汉、梁鼎铭、梁中铭、张光宇、特伟、吴组缃、张仃、张乐平、陆志庠、鲁夫、鲁少飞、刘清扬、刘钟望、王向辰、何容、刘一行、叶浅予、赵逸云、沙雁等知名人士。该刊是一

种以抗战为主题的画刊，主要通过漫画和木刻宣传抗日。

《抗日三字经》：1938年3月出版，著者王向辰。该书采用上图下文的形式，每页的上方是各种反映抗战的图画，下方是根据传统蒙学形式编写的宣传抗日的三字经。书中的图画与文字内容相得益彰，图画有着很强的感染力，文字内容也朗朗上口。

《抗战诗歌集》：1938年3月出版，著者冯玉祥。冯玉祥认为写诗也是一种抗战方式，但他不赞同写一些风花雪月的雅诗，因为雅诗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不符。他将自己的诗称为“丘八诗”，该书收录了80首这类诗，主要聚焦于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宣扬民众的抗日热情。

《不忘国仇问答》：1938年3月出版，著者冯玉祥。冯玉祥认为民众的力量不可忽视，“我们要想使一般民众明了这次抗战的意义是自卫，是争取国家民族的生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敌人在各地残杀毒害我同胞的种种事实告诉他们”。因此，该书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记录了日军在沦陷区的各种暴行。

《诗歌近作集》：1938年4月出版，著者冯玉祥。该书分为三辑，第一辑包含33首随感诗，主要记述对生活的感触；第二辑包含31首乡居纪事诗和17首浙游纪行诗，主要记述乡居和旅行中的见闻；第三辑包含80首箴铭类短诗，主要记述对生死、革命、为人、忠孝、善恶等问题的见解。

《抗日的伟大民众》：1938年4月出版，编者冯玉祥。冯玉祥指出这本书是根据民众的抗日事迹编成的，“这些英勇壮烈的事迹，是民众的心血写成的，是中华民族无上的光荣；同时，是争取抗敌胜利的基础”。书中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表扬这些抗敌救国的

事迹，进而激发民众对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强烈信心与决心。

《日本对在华外人之暴行》：1938年5月出版，编者冯玉祥。该书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分析日本对在华外国人的暴行，并指出日本是想以中国为根据地来征服全世界。冯玉祥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让友邦一起对付日本这个世界强盗，他指出：“我们中国人是立下决心打强盗了。可是我们也希望各友邦清楚认识日本不仅是中国的敌人，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共同的敌人。希望为着更远大的目的和利益，大家携起手来打这日本强盗。”

《抗日的模范军人》：1938年5月出版，编者冯玉祥。该书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宣扬北、东、西三个战场抗日模范军人的英勇事迹。其中，北战场有吉星文、佟麟阁、赵登禹、汤恩伯、张自忠等15位模范军人；东战场有姚子青、八百壮士、胡宗南、王修身、段云清、廖宝财、宝山三士兵以及一位无名英雄等模范军人；西战场有郝梦龄、刘家麒、郑廷珍、张全和等4位模范军人。冯玉祥认为，用这些英勇抗战的具体事迹提升军民抗战情绪，是充实军民精神的方法之一。

《倭寇内部的危机》：1938年5月出版，编者是冯玉祥。冯玉祥指出：“现代战争的胜负，不是单纯军事的，须要‘知’的范围也就更广；这‘知’又限于主持军政大计的人，一般民众对于敌人方面的情形也不应该茫无所知；敌人内部的种种危机，尤其是我国一般民众所亟应知道的。”本书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讲述诸多日本国内的危机。

《保卫武汉》：1938年6月出版，编者李力。李力认为：“我们要把最大的注意放在保卫武汉的工作上。因为从这个工作当



三户图书印刷社出版的《保卫武汉》

中，我们可以把抗战的力量更好地集中、编排、组织，可以大大消耗敌人的力量，使我们有利地转入反攻驱逐倭寇的第三期抗战。”书中收录了周恩来、王明、博古、彭雪枫等人关于保卫武汉的文章，李力希望每一位同胞都能认真研读，为保卫武汉贡献力量。

文章入伍 凝聚力量

这些书刊都是当时思想动员的工具，与抗战的历史背景紧密相关，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烙印和独特的文化价值。其主要特点包括：以抗战救亡为主题、以通俗易懂为风格、以形式多样为策略、以民族意识为纽带，这些特点使其成为了宣传抗战救亡的有力武器。

（一）以抗战救亡为主题。

这些书刊都以抗战救亡为主题，其中有着大量充满战斗性的图文，旨在激发民众的抗日情绪，强化战时社会的凝聚力。比如，《抗到底》的发刊词提到：“我们希望这里边的每一篇文章，甚至每一个字，都有炸弹般的力量，炸碎敌人的阵垒”，刊名“充分代表着本刊的特性：我们要根绝妥协，永不屈服，抗战到底。我们不说大话，但绝对不说软话，不说于抗战无益的话，更不为谁造消闲趣话。我们愿以血为墨，使文字化为武器，赠与全国的同胞”。

赵望云在讲述《抗战画刊》的意义时，提到他与朋友们本着“抗战第一”的宗旨出版这个画刊，“我们不能拿枪，纸弹如能在抗战宣传发生点功效，就算尽了我們一些职责”。《抗日三字经》言：“日本鬼，欺中华。似恶兽，似毒蛇。占我地，杀我民。又抢掠，又奸淫。恨如海，仇如山”，简单直接地抨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另外，冯玉祥的诗歌“完全是提高抗战情绪的最富有民族意识的诗歌”，几乎每篇结尾都附有几句鼓励人民抗日的话语。何容强调：“我们无论作什么事情，只要是以抗战为目的，合于抗战的需要，能增加抗战的力量，便是一种救国工作。冯先生这一部《抗战诗歌集》，便是他的救国工作之一。”吴组缃在评价冯玉祥的《诗歌近作集》时，也指出其中的诗表现了他全部的精神生活，“精诚团结，一致抗日，是他坚持不移，力促其成的政治目标”。

（二）以通俗易懂为风格。

这些书刊普遍呈现出通俗易懂的风格，这与冯玉祥等人重视通俗化写作的主张密切相关。冯玉祥认为诗文写作要老少皆宜。1938年2月24日，他在与《大公报》编辑陈纪滢会面时指出：“我们现在许多诗文，

还谈不到真正通俗，没有作到小孩、老太太听见一念就能知道意义，一般文人还要讲韵字的多少。”他强调，在抗战时期，创作的首要任务并非追求文雅，而是要保证文化水平较低的军民能够听懂，为他们提供精神食粮。他说：“现在的时期不是讲雅的时候，要人人懂得意义，不是像以前写一封电报要马字边的全篇都是，车字边亦如是，这有何用处呢。”

冯玉祥还劝告其他文艺作家，在创作时要考虑到民众的文化水平，要做到通俗化写作。1938年3月27日，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大会上，他对文艺作家们说：“我们的工作应该普遍地深入民间，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顾到大众的文化水准，也就是说要力求通俗化。我是当兵出身，深奥的作品无法使一般民众领略，我自己就经历过。写作的人要设身处地为大众设想，要写出大众能够看得懂的作品，文艺的力量才会普遍的深入民间。”

冯玉祥热衷于创作“丘八诗”，他想借助诗的形式，发挥唤醒民众的作用。吴组缃在评价他的《抗战诗歌集》时，指出其具备四个特点：“一是文字朴实，二是形式通俗，三是满带热烈浓厚的感情，四是说的都是具体而浅近的事情”。吴组缃在评价他的《诗歌近作集》时，再次指出他的诗风是清楚和俗浅，“清楚，是因为他的生活永远脚踏实地，所以说话也就无从玄虚；俗浅，是因为他永远把自己看成大众里面的一个，所以力求说自己的话即如大众的话”。

王向辰主张“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致力于将文化的力量深植于军民之中，他的《抗日三字经》就是这一主张的体现。作家王平陵评价这本书努力做到了“通而不俗，俗不伤雅”的效果，“没有冷僻的字，生硬



三户图书印刷社出版的《抗战诗歌集》

的语句，灰暗的意义”，是一本有利于抗战的好书。老舍称王向辰“意在以通俗文艺辅导激励民众与军士，期人人尽力，齐心扫灭倭敌，争得最后胜利。”这种通俗易懂的风格确实有助于扩大受众范围，使得即使文化水平较低的民众也能轻松明白其中的抗日思想。

（三）以形式多样为策略。

这些书刊的形式丰富多样，涵盖了诗歌、问答、画报、歌曲、戏剧以及通俗故事等。老舍与冯玉祥均倡导将抗战内容与多样化的文艺形式相结合，以此宣传抗战救国思想。老舍主张将大鼓词等传统曲艺注入抗战内容。1937年12月5日，老舍在拜访冯玉祥时提到，由于“大多文章皆不能普遍于民众，于是以民间大鼓词之形式，而注入新的内容，在山东曾一度实施宣传，结果大受民众欢迎，故以后仍拟继续著作，并拟散播于

前线士兵间”，冯玉祥认为这种形式非常好。1938年1月，老舍撰文指出：“大时代到了，大时代的文艺，不用说，必是以民间的言语道出民族死里求生的热情与共感，从事文艺创作的现在不但要住脚民间，还须学到民间的言语与民间文艺的形式与技巧。不然，便仍是费力不讨好。”

《抗到底》的体裁也十分多样化，包括诗歌、画作、歌曲、京剧、大鼓词、小调、麻城调、小说和通俗故事等。其发刊词指出：“我们希望登载各种不同体裁的文字，得到无量数的读者，也就是希望得到无量数的战士。”《抗战画刊》则以漫画、木刻版画、三字经、诗词、歌词等形式，图文结合地抨击日军侵略、呈现战争场景、呼吁坚持抗战，有着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这样有助于突破文化水平的限制，供不同层次的读者阅读。冯玉祥的《不忘国仇问答》《抗日的伟大民众》《抗日的模范军人》《倭寇内部的危机》等书，皆采用问答的形式编写。这是因为冯玉祥觉得“编成各种问答，浅显白话，使每个国人，都能深切了解，如此对抗战前途，不无补益”。这种形式通过模拟两人对话的场景，能够降低理解的门槛，更加贴合战时民众的认知需求。

（四）以民族意识为纽带。

这些书刊还通过各种方式强化民众的民族意识。有的书刊以岳飞、戚继光等历史上抵御外侮的英雄人物为典范，宣扬保卫国土、捍卫民族尊严的精神。如《抗日三字经》言：“昔岳母，训武穆。背刺字，精忠谱。岳家军，奋威武。打金兵，复故土。唐张巡，称忠良。禄山反，守睢阳。与城池，共存亡。美名姓，万世扬。不成功，便成仁。古圣训，记在心。”不仅如此，《抗日三字经》还将历史上的抗倭事迹融入抗日宣传之中，串联

戚继光抗倭、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等历史事件，凸显日本侵华的历史由来已久，呼吁要抗争到底。这样不仅构建起了抵御外侮的连贯叙事，更能在文化与心理层面凝聚全民族的抗战意识。有的书刊大力宣传我国军民抗日的英勇事迹，将其升华为民族意识的象征符号。比如《抗日的模范军人》等书刊中的叙事，通过塑造集体观念，将国家存亡与个体命运紧密相连。

总之，冯玉祥深知文化抗战在民族危亡之际的重要性，他呼吁：“我们在努力增加有形的抗战力量而外，更需要增加无形的抗战力量。我们必须为前线战士，后方同胞，供给一些抗战的精神食粮；输入一些新的血液。”在全面抗战的历史背景下，三户图书印刷社的创办，为抗战的精神食粮提供了生产平台，是冯玉祥文化抗战思想的具体实践，是武汉文化抗战的一面旗帜。它出版的书刊，记录了侵华日军的暴行，宣传了我国军民的英勇，起到了激发全民族抗日斗志的历史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 [1] 冯玉祥：《冯玉祥日记》第5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 [2] 《发刊词》，《抗到底》1938年第1期。
- [3] 冯玉祥：《不忘国仇问答·序》，武汉：三户图书印刷社，1938年。
- [4] 冯玉祥：《抗日的伟大民众·序言》，武汉：三户图书印刷社，1938年。
- [5] 冯玉祥：《日本对在华外人之暴行·序》，武汉：三户图书印刷社，1938年。
- [6] 冯玉祥：《倭寇内部的危机·序》，武汉：三户图书印刷社，1938年。
- [7] 冯玉祥：《为战士与民众准备精神食粮》，《抗到底》1938年第7期。

[8] 冯玉祥：《抗战诗歌集·自序》，武汉：三户图书印刷社，1938年。

[9] 李力：《保卫武汉·序》，武汉：三户图书印刷社，1938年。

[10] 赵望云绘、程征著：《赵望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11] 王向辰：《抗日三字经》，武汉：三户图书印刷社，1938年。

[12] 何容：《序一》，载于冯玉祥《抗战诗歌集》，武汉：三户图书印刷社，1938年。

[13] 吴组缃：《序》《序二》，载于冯玉祥《诗歌近作集》《抗战诗歌集》，武汉：三户图书印刷社，1938年。

[14] 王平陵：《序三》，载于王向辰《抗日三字经》，武汉：三户图书印刷社，1938年。

[15] 老舍：《序一》，载于王向辰《抗日三字经》，武汉：三户图书印刷社，1938年。

[16] 老舍：《三个月来的济南》，《战地通信》1938年第9期。

李亚南，历史学博士，湖北省图书馆馆员

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留日风潮

◇ 陶光胜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地处武陵山区腹地的鄂西恩施发生了一件轰动全省的大事。杉木坝一位叫做尹莲（婚后随夫姓改名为王莲）的女子自费东渡留学，进入东京女子工艺学校学习绘画，开风气之先，成为清末湖北第一位留学日本的女生。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旧观念依然深入人心的晚清，在出国留洋还是新兴事物、时髦之举的时代，偏僻的恩施出了这么大一桩奇闻，不仅成为街头巷尾津津乐道的谈资，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所有的现象都是本质呈现在时代中的印记。王莲留日的小故事，从侧面反映出晚



中国早期留日女生合影，前排左二为日本女子教育先驱下田歌子，后排左三为湖北留日女生王莲

清时期湖北留日风气之盛，其背后成因离不开影响晚清政局和湖北近代走向的风云人物——张之洞。张之洞于同治二年（1863年）高中殿试一甲第三名，赐进士及第。这名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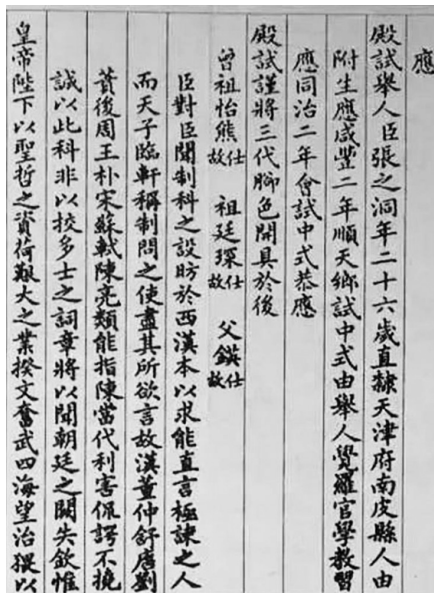
科探花出生于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其父张钹曾任贵州兴义府知府。张之洞耳濡目染，无论在哪里为官，对文教事业都非常上心，始终认为“自强之策，以教育人才为先；教战之方，以设立学堂为本”。特别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以后，在他18年的督鄂生涯中，致力于兴学育才、奖掖留学，掀起了一股留日风潮。

序曲：书院积习过深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湖北有着悠久的文教传统，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建立了几几乎遍及全省的上百所旧式书院。这些书院一方面成为湖北教育的重要资源，是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另一方面教学内容陈旧，有的学风涣散，甚至沦为生员借以考课骗取膏火钱的场所，已经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

张之洞在朝野素有“通晓学务”之名，从同治六年（1867年）调任湖北学政起与荆楚结缘，开始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来改革湖北教育的历程。甲午战争前，张之洞在湖北先后主持新建了经心书院、两湖书院，采用新式教学法，增设西学课程，并陆续对旧式书院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革。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张之洞于悲愤之中给朝廷上了一本万言折《吁请修备储才折》。折子中写道，“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这份折子鲜明表达了张之洞关于富国强兵急需人才的思想。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复杂尖锐的国内矛盾，以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大规模引进和学习西



张之洞同治二年应殿试的部分试卷

方先进科学技术，兴办船政局、机器局等近代化军用企业和轮船、铁路、电报、邮政、采矿、纺织等新式民用工业。与此同时，他们也深刻感受到新式人才的稀缺和重要。为了更好地兴办洋务企业，就必须加快培养更多的传统官学所无法培养的洋务人才，必须变革弊病丛生的封建传统教育，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教育模式、培养体系。

甲午战争的失败深深刺痛了张之洞，“惶悚痛愤，寝食难安”，也加快了张之洞革新湖北教育、培育新式人才的步伐。张之洞首先拿书院开刀，他指出：“今日书院积习过深，假借姓名希图膏奖，不守规矩，动滋事端。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颁布“预约变法”的上谕。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应慈禧改革上谕，联署了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包括《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附《请筹巨款举行要政片》，系统提出了兴学校、

练新军、奖励工商实业和裁减冗员等改革措施，成为清末新政的蓝图。

“江楚会奏”以后，清廷下令：“人才为政事之本……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作为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的策源地之一，湖北在张之洞的领导下掀起了一股书院改学堂的热潮。经心书院、两湖书院在1898年的改革之后再次变革，相继改为勤成学堂、文高等学堂（亦称两湖大学堂），从办学宗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要求、考试方法、学校管理等方面全面转为新式学堂。武汉以外的各府州县书院也相继改成学堂。湖北改书院为学堂，从整体上来说，进程是顺利的，改革是成功的，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

张之洞认为：“国势之强弱在人才，人才之消长在学校，环球各国竞长争雄，莫不以教育为兴邦之急务，其制以大学造就文武之通材，以小学蒙学启发国民之忠义，化成国民之善良。”在整顿旧书院之外，张之洞为发展洋务事业，实现求富求强，还新办了很多实业、文武等方面的新式学堂，以及一大批普通学堂，包括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铁路学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武备学堂、湖北军医学堂等等。同时，建立了完备的教育系统和管理制度，并积极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大量培养掌握西学知识的新式人才。

经过张之洞的重大改革和发展，到1907年，湖北有各级各类学堂1512所，学生57751人。湖北教育的许多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成为全国教育的示范省。虽然这些改革的初衷没能脱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封建文化桎梏，但客观上开启并极大

推进了湖北教育近代化的进程，奠定了今日湖北教育大省的基础。

高潮：西洋不如东洋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1899年1月），东去长崎的日本客轮“萨摩丸”号鸣着汽笛驶离上海码头。一位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意气风发地挥手告别岸边送行的亲人，不顾风浪站立船头，踌躇满志地凝视远方。与其同行的湖北学生还有19人，他们都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精挑细选前往日本学习武备的留学生，而这位年轻人就是张之洞的长孙张厚琨，祖父寄予厚望将其送往日本学习军事。在张之洞的亲自示范下，像张厚琨这样从荆楚启程前往日本求学的年轻人在随后的日子里还有很多很多。

其实，自同治十一年（1872年）起，清政府就陆续选派四批幼童留美和三届福建船政学堂学生留欧，共计约200人。这些洋务留学生虽然数量较少、规模较小，但却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教育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历程中最名副其实的一步，詹天佑、严复、蔡绍基、萨镇冰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议行新政以后，官方开始大张旗鼓地倡导留学，并在1903年公布《约束鼓励出洋游学生章程》，明确规定对留学毕业生给予进士、举人等相应的科名奖励，极大助推了出国留学。1905年废科举以后，士人为寻求新的出路，再加上一系列奖励留学政策的刺激，纷纷出国留学，留学之风日盛。清末很多留学政策本就出自张之洞之手，他提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在张之洞的亲自主持和不遗余力的推动下，湖北自然而然地成为

了晚清留学潮的翘楚省份，留学生派遣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在出国留学中，张之洞又特别青睐赴日留学。特别是甲午战败以后，张之洞进行了深刻反思，他认为日本迅速崛起、雄视东方的原因，就在于派遣人才学习西洋。张之洞指出，“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方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张之洞认为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榎本武扬、陆奥宗光等明治维新的核心人物，皆有留学经历，此为日本强盛之重要原因。中国要想富国强兵，就要像日本那样，派遣学生出国留洋。那么，出国游学是到日本还是到欧美？换句话说，是到东洋还是到西洋呢？张之洞慎重地选择了东洋。为此，张之洞于1898年2月先行委派姚锡光、黎元洪、张彪、吴殿英等花3个月时间，游历详考日本的各种学校章程。张之洞认为：“日本与我同种、同教、同文、同俗，又已先著成效，故中国欲采取泰西各种新学新法，允宜阶梯于日本，必须有明白事理究心学术之员前往游历，详考各种学校章程，实有领悟，方足以资仿效。”

经过深思熟虑和派员实地考察，1898年5月，张之洞发表著名的《劝学篇》，其中写道：“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张之洞认为，日本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跟中国都比较接近，西洋文化经过日本“删节



湖广总督张之洞

而酌改”之后，更适合中国直接学习、借鉴，再加上两国距离较近、费用较少，因此去日本留学事半功倍，是“性价比”较高的选择。

光绪帝对张之洞的《劝学篇》给予高度好评，认为此篇“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遂令各省广泛刊行，并于当年8月2日诏谕军机大臣等：“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令著即拟订章程，咨催各省迅即选定学生陆续咨送；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并咨送，均毋延缓。”

在张之洞留学思想的指导下，湖北掀起了留日教育的高潮，赴日留学人数逐年增多，且在全国留日学生总数中占有极大比例，成为清末湖北留学教育的一大特色。1896年清政府第一批13个官派留日学生中，就有湖北籍学生。1898年5月，日本驻清公使矢野文雄出于扩大日本在华势力的深



清末小说《文明小史》反映清朝公使与留学生会面的插图

层次目的，向清政府提出日本可以接收 200 名中国学生赴日研习军事、器械、文法等建议，日本方面可以负担一定的留学费用，“每名留学生一年发放 200—300 日元，总计日本方面负担 6 万日元”。各省大臣对此反应冷淡，总体上不甚积极，200 名指标没能用完，实际成行者仅 48 人，其中湖北籍学生就占了 20 人，达到 41.7%，可见湖北留日之踊跃。

清末新政以后，留日教育步入快车道。张之洞在湖北学务处下特设“游学科”统辖出洋游学游历事务，为包括留日教育在内的留学管理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1901 年，湖北留日学生 49 人，占全国留日学生总数的 18%；1902 年，增长到 126 人，占全国留日学生总数的 21%；到 1905 年废科举的时候，湖北留日学生数迅猛增长，达到 423 人。辛亥革命前夕，湖北留日学生总数累计达到 5000 余人，位居全国第一。

湖北留日学生所就读的学校和所学的专

业非常广泛，涵盖了军事、工科、理科、语言、师范、政法、美术、史地、商业、农牧、体育、医药、染织等各学科，基本包括了日本当时所开设的全部学科。但总体而言，以军事、法政、师范等科居多。宏文学院、振武学校、成城学校、法政大学等成为接收湖北学生较多的日本学校。在留学政策的鼓励和留日风潮的影响下，湖北留日学生不仅有官派，自费留日的也非常多。从全国来看，留日自费生的数量比官费生还要稍微多一些。1901 年留日热潮刚刚起步时，湖北留日学生中自费生比例就接近四分之一。前文所述的王莲，就是 1902 年留日大军中的自费生。

宣统年间（1909—1911 年），由于留日学生革命化倾向加剧、清政府对留日政策的收紧、日本对清朝留学生政策的调整以及“庚款留美”计划的实施等各种因素，留日学生开始大幅减少，赴欧美诸国留学的学生开始日渐增多，湖北也不例外。

结果：岂知种豆得瓜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初秋，时任清政府外务部员外郎的戢翼翬，被以“向不安分，交结匪类”的罪名即行革职，押解回湖北原籍。戢翼翬是 1896 年清政府第一批 13 个官派留日学生之一，也是第一个留学日本的湖北人，留日前就读于张之洞创办的新式学堂——湖北自强学堂，在张之洞的兴学政策中具有标志性意义。戢翼翬到达日本后，在与孙中山的交往中，逐渐倾向于革命，加入兴中会，与友人在东京创办《国民报》，呼吁国人反清排满。1905 年 7 月，清廷首次考试留洋毕业生，戢翼翬获赐政治经济科“进士出身”，分发外务部任主事，暗中从事革命，直至事发。

戢翼翬的事情对张之洞刺激很大，自己费尽心思、寄予厚望的一批高材生，在赴日留学后却走上了自己不愿意看到的相反道路。对于唐才常、戢翼翬等昔日门生的革命行动，张之洞的内心是复杂的，有一丝同情，有一丝怜悯，更多的可能是不甘和不解。在戢翼翬事发前约一个月，张之洞就已经奉旨调离湖北，进京履职，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入值军机处。张之洞怀着满腔不舍与忧虑，离开了他经营奋斗了18年的两湖之地。宣统元年（1909年），张之洞在京逝世。张之洞逝世后，四川总督赵尔巽奏请为其设祠，其中特别强调“其生平精神所寄，尤在振兴教育，储备人才，以备国家缓急之需，而救当世空疏之习。”张之洞一生致力于教育，为洋务事业和国家发展培养和储备了农、工、商等各科急需人才。但正如湖北巡抚端方所言：“造就人才的是湖北，我所虑的也在湖北。”

留学生作为直接接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群体，是推动中国近代化的一支极其重要的力量。从清末新政开始，短短十年之内，



湖北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办的革命刊物《湖北学生界》

数以千计的湖北学生奔赴日本求取新知。为了督促留学生“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张之洞先后派遣钱恂、查双绶等人充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考察学生品行、学术，辨别优劣、勤惰，做好学生日常行为管理。此外，清政府在东京设立“留日学生监督处”（后改为“游学生监督处”），并于1906年颁行《管理游学日本学生章程》，一方面提供针对留日学生的服务、帮助和支持，一方面做好监管、引导和规范。

思想的藩篱一旦打开，犹如开闸之水，一泻难收。由于甲午战败和中国的落后，留日学生在日本备受欺凌，饱尝辛酸。他们在异国他乡深切地感受到中日两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社会法制、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差距，视野得到极大的开阔，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愈加浓厚，逐渐有组织地探寻中国落后的体制机制原因。他们翻译了大量的日文西学书籍，广泛传播资本主义思想，并以留日学生为骨干，形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群体，投身于民族革命和反清斗争。1905年8月，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武昌两湖书院的优秀毕业生、张之洞亲自选送赴日留学的黄兴担任庶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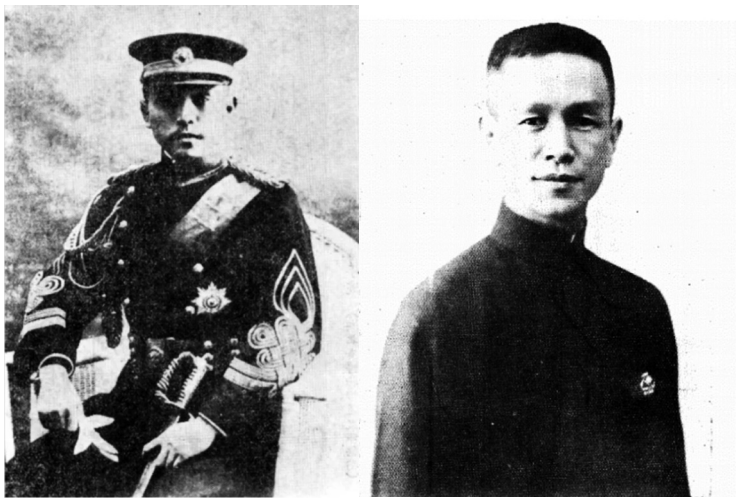
湖北籍学生作为留日学生中的一大群体，广泛地参与革命活动。1903年1月，湖北留日学生刘成禺、李书城等在东京创办以“输入东西之学说，唤起国民之精神”为宗旨的革命刊物《湖北学生界》，该刊宣传民族独立，抨击君主专制，鼓吹民族民主主义，思想激进、观点犀利，是第一个以省区命名的留学生刊物。湖北留日学生基数大、数量多，有影响力的人物多，接受新思想新学说和反对清王朝统治的学生也日益增多。到1906年，湖北留日学生就有106人加入

了同盟会。这些学生办刊物、组社团、开学堂、入新军，日后成为辛亥革命的骨干力量，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正如孙中山所评价的那样，张之洞成了一位“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烽火在武昌点燃，并迅速席卷全国。湖北新军作为起义的主要力量，其各级军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接受了新思想的留日归国学生，在他们的影响下，许多基层士兵也开始倾向革命，为武昌

起义奠定了坚实基础。除此之外，孙武、刘公、吴禄贞、蒋作宾、蓝天蔚、杨缵绪、居正、张知本、李四光、陈时、黄侃等众多湖北留日学生也以各种形式，纷纷参与到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中去，而他们都得益于张之洞当年兴学校、练新军的改革政策。日本著名学者实藤惠秀在其著作《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相信，如果没有留日学生，则中国革命、特别是辛亥革命，是难有进展的”。

历史给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他的本意是派遣优秀人才、学习先进科技、归国富国强民，却不成想，这一举动间接地加速了清王朝的覆亡，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为此，民国著名教育家、张之洞的门生、湖北官费留日生、同盟会成员张继煦在《张文襄公治鄂记》中感叹道：“抑知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二十年缔造之力也。其时工厂林立，江汉殷赈，一隅之地，足以耸动中外之视听。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



湖北留日学生、辛亥革命烈士吴禄贞和中华大学校长陈时

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素所培植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虽为公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

在时代的大潮中，每一个个体都是卷起的浪花。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始终葆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始终葆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担当，始终葆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志向。这种“士志于道”的使命自觉，在国家危亡、民族危急的苦难之际，迸发出舍生取义、求索奋进的磅礴力量。无论是张之洞，还是其培养的留日新式人才，在中华民族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都从不同角度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他们的功绩值得铭记。

陶光胜，教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校办公室副主任

一叶香茗镌刻的文明足迹（上）

——万里茶道发展简史

◇ 周 耕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茶原产于华夏，与咖啡、可可并称世界植物三大饮品。英国学者李约瑟将茶誉为继四大发明之后，中国馈赠人类的第五大贡献。一片茶叶，承载着山川之灵、人文之秀。从神农以“茶”解毒，到西汉茶从祭品、药品变为饮品；从唐代陆羽著《茶经》立茶道之典，到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阐发茶的医疗养生功效；从宋徽宗赵佶倡导文人雅茶，到明太祖朱元璋“废团为散”让茶飞入寻常百姓家——茶已深植于中国人的生活，成为“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中华国饮”。

一叶香茗，跨越山海。千百年来，一缕缕茶香搭丝绸之路横跨亚欧，乘茶马古道通往雪域，借大航海飘向全球。17世纪，纵

贯中俄蒙的万里茶道应运而生。这条世纪动脉南起武夷山，北抵俄罗斯圣彼得堡。一叶叶风帆、一队队马驼，将茶带入广袤的俄罗斯大地和苍莽的蒙古草原。汉口，也因其水陆枢纽作用而享誉“东方茶港”。

华夏茶乡，千年茶脉——中国茶叶发展

发乎神农，茶源初现。茶古名为“荼”，最初因其药用价值被先民发现。《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得荼而解之。”浙江余姚田螺山文化遗址发现6000年前人工茶树遗迹。萧山跨湖桥新石器遗址发现8000年前茶遗存，印证了中国悠久的种茶历史。

起始于汉，茶风渐起。西周时期，巴蜀地区开始人工种茶。《诗经》中“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记录先秦采食茶饮的生活日常。《周礼》中“掌以时聚茶，以供丧事”，记载因茶之苦而作祭祀之用。西汉王褒《僮约》（前59年）记载“烹茶尽具”“武阳买茶”，茶事始入文字。古人煮“茶”为汤，以铜、漆、粗陶制茶具。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清谈伴茶而行，寺庙禅修催生“禅茶一味”思想，茶道精神萌芽。

兴起于唐，茶道立典。唐肃宗上元年间（760年），茶圣陆羽著世界首部茶专著《茶经》，正式简笔“荼”为“茶”，论述茶之“源、具、造、器、煮、饮、事、出、略、图”十大体系，阐明“调五脏、通经络、清热降火、消食化积、明目益思”养生功效，倡导“精行俭德”茶道精神。唐代《本草拾遗》称“茶为万病之药”。唐开元年间饮茶之风遍及朝野，煎茶法成为主流，“南青北白”两大瓷系茶具配套成熟。文人墨客以茶寄情，僧皎然“三饮茶歌”道尽品茗妙境：“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卢仝“七碗茶歌”成为传世名篇：“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

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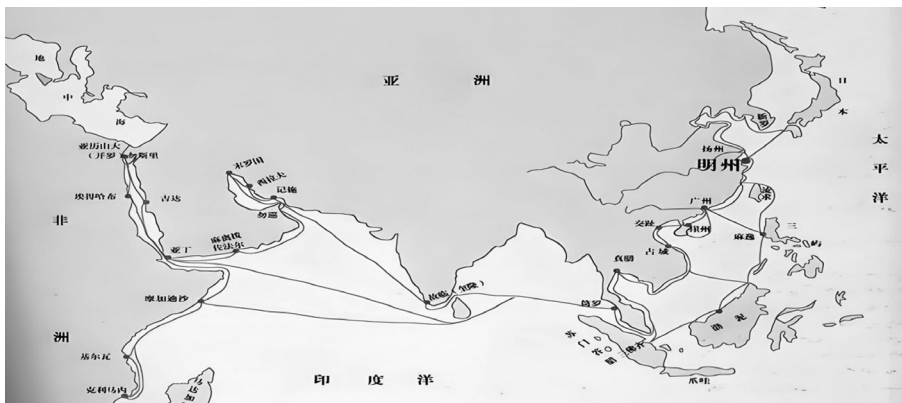
盛行于宋，雅趣纷呈。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宋徽宗赵佶著《大观茶论》20篇，完整论述茶叶种植、采择、制作、器具、品鉴等，阐释了茶文化“致清导和、中澹闲洁、韵高致静”的精神内涵。龙凤团茶为宋代皇家贡茶，黑釉建盏成为经典茶器，点茶、分茶、斗茶、茶百戏风靡朝野。《东京梦华录》记载：“东十字大街，茶坊每五更点灯……至晓即散。”苏轼嗜茶成癖，留下“从来佳茗似佳人”“恰似饮茶甘苦杂”“且将新火试新茶”等词句，茶诗相映、唇齿留芳。

变革于明，全民普饮。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诏令“罢造龙团，惟采芽茶以进”，废团为散，改蒸青为炒青，饮茶方式演变为简便的冲泡法，紫砂、青花瓷壶兴起，茶风简朴务实，推动了全民普及饮茶。并完善茶马律法，官、民茶市并行。李时珍《本草纲目》阐述茶之药用养生功效：“温饮则火因寒气而下降，热饮则茶借火气而升散，又兼解酒食之毒，使人神思闾爽，不昏不睡，此茶之功也。”

大成于清，融于日常。清代“绿、黄、白、



古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

红、黑、青”六大茶类完全定型。宫廷茶宴、民间茶馆鼎盛，三才盖碗成为主流茶具，景德镇青花、粉彩、珐琅、斗彩茶器技艺登峰造极。茶叶位列“开门七件事”，成为百姓生活必需品。纳兰性德“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词句流传至今。

古道纵横，茶香寰宇——万里茶道形成

茶与丝绸、瓷器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外销品。西汉兴起的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打通横跨亚欧的古商贸通道；唐初兴起的茶马古道，维系西南与雪域高原的“茶马互市”。这两条古道为明清兴起的中俄万里茶道积淀了商贸基础。在大航海时代，远洋航线推动中国茶传遍全球，传统古道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而茶叶承载的文明交流绵延千年、经久不断。

丝绸之路，亚欧茶香（西汉前2世纪兴起）。丝绸之路是横跨亚欧、连接东西方的古商贸文明通道，分为陆上与海

上两线，茶与丝绸、瓷器等贸易品经此向西方传播。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次命名“丝绸之路”。1967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提出“海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至明代1529年）。

先秦周穆王西征开辟最早的草原丝路通道。西汉时期，汉武帝两度（前138年、前119年）派张骞出使西域，“凿空”长安经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通道；前60年设西域都护府；东汉永元九年（97年）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古罗马）。唐代鼎盛，设安西四镇，丝路经中亚、高加索通向拜占庭、阿拉伯帝国。安史之乱（755年）后陆路受阻。宋代南迁，以海上通道为主。元代重开陆路、陆海并行，贯通欧亚全境。明代“土木堡之变”（1449年）后逐步失去对北疆控制，嘉靖八年（1529年）放弃西域退守嘉峪关，加之奥斯曼帝国阻隔欧亚陆路，陆上丝路衰落。清代乾隆时期虽收复西域，但严格闭关管控，民间跨境贸易停滞。陆上丝路主线7000公里，



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



茶马古道路线图

分为草原森林路、沙漠绿洲路、南方丝路三大线路。

海上丝绸之路（至清末 1842 年）。西汉汉武帝平定南越（前 111 年）后，开辟两广徐闻、合浦通往印度、斯里兰卡的近海航线。唐代安史之乱后海上丝路崛起，以广州、明州（宁波）为核心，横渡阿拉伯海，延伸到波斯湾、红海沿岸。宋元民间海商远洋贸易繁荣，泉州成为世界第一大港，航线贯通印度洋直达东非，经红海转运至地中海。明初海禁。永乐宣德年间（1405—1433 年）郑和七下西洋开启“朝贡贸易”，在满刺加中转，最远抵达天方、肯尼亚。明宣德十年（1435 年）停止下西洋，海上丝路萧条。隆庆开关（1567 年），漳州月港短暂开放，民间外贸短暂恢复。清初再度海禁，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开启四口通商，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改广州一口通商，民间外贸萎缩。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签订《南京条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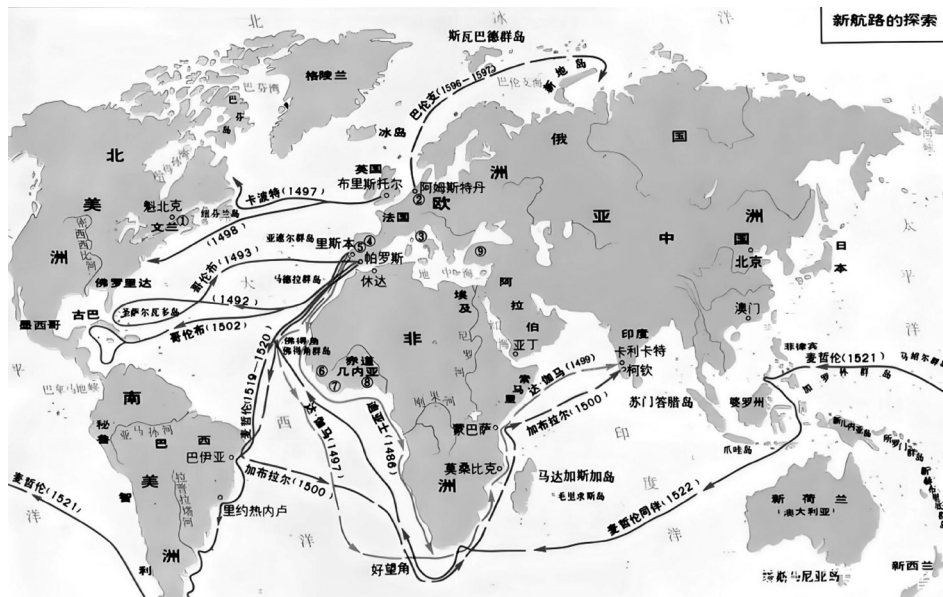
实行五口通商，海上丝路落幕，融入航海线路。海上丝路主线 14000 公里，分东线、西线两大航线。

茶马古道，雪域茶魂（唐初 7 世纪—清末）。茶马古道是古代西南依托“茶马互市”形成的重要商贸走廊。因藏区需以茶解牛羊肉之腻，中原需良马固边强兵，形成延续千年的“以茶易马”贸易模式。汉代西南“五尺道”“永昌道”为古道雏形，民间已有茶、马、盐交换。唐代贞观十五年（641 年）文成公主入藏，唐蕃古道全线贯通，官方“茶马互市”正式开通。宋代设茶马司，实行官茶专营，修整山路，设立驿站，“以茶御番，以马固边”成为羁縻治理之策。元代官、私并行，民间私茶贸易日趋活跃。明代达到鼎盛，碉门路成为主干道，普洱茶崛起，马帮规模空前，往南延伸到缅甸、老挝，往西连通不丹、尼泊尔。清末随着火器发展、战马需求锐减，雍正十三年（1735 年）茶马司裁撤，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茶马

互市终止。20世纪50年代后,川藏、青藏、滇藏公路及成昆铁路先后通车,传统马帮彻底退出。茶马古道主线长4000公里,支线延伸至印度、尼泊尔、缅甸、老挝等,分川藏线、滇藏线、青藏线三条线路。

大航海时代,茶播全球(15世纪末—17世纪初)。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阻隔陆路通道,欧洲各国开启远洋探索,争夺东方的丝绸、茶、瓷器和香料贸易。葡萄牙开辟东线。1488年迪亚士到达好望角;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跨印度洋抵达印度;1511年阿方索占领马六甲,通往澳门、日本。西班牙开辟西线。1492年哥伦布横跨大西洋发现美洲;1519年麦哲伦船队经麦哲伦海峡、绕好望角实现首次环球航行;1565年乌尔达内塔开通马尼拉大帆船航线,成为中国茶中转枢纽;1577年英国德雷克开辟第二条环球航线;1616年荷兰斯豪滕发现合恩角。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连通地中海与红海;1914年巴拿马运河通航,连通太平洋与大西洋,大幅缩短远洋航程。

大航海时代极大地促进了茶叶贸易。1556年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尔·达·克鲁兹将茶介绍到欧洲;1610年荷兰人将茶转运到阿姆斯特丹;1662年英国查理二世迎娶葡萄牙凯瑟琳公主将茶带入宫廷;167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将茶卖到美洲;1689年



大航海线路图

英国船首次直泊厦门买茶,当时中国茶占据全球90%以上。伴随商贸往来,中国丝绸、瓷器、茶艺相继外传。18世纪初,法国传教士将景德镇全套制瓷技术及《农政全书·蚕桑篇》传入欧洲;184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罗伯特·福琼带走2万多株茶苗、8名制茶工人,在印度、斯里兰卡大规模种茶。1888年,印度茶在英国市场占有率首超中国,彻底改变全球茶贸易格局。

茶叶贸易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英国先后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1588年)、掀翻荷兰“海上马车夫”(1652—1674年)、打赢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年),确立海上霸权。为弥补战争亏空,英国1773年颁布《茶税法》引发波士顿倾茶事件,成为美国独立战争导火索。为扭转茶叶贸易逆差,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换取白银,引发1840年鸦片战争。

《武汉劝业奖进会笔记》前言

——“武汉劝业奖进会二题”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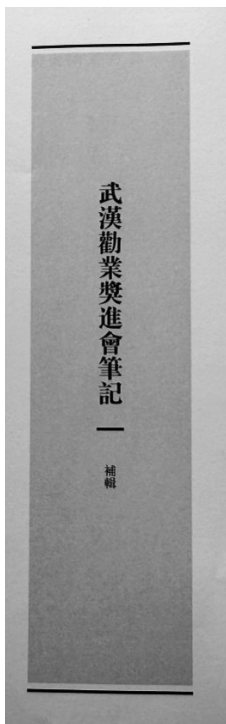
◇ 涂文学

宣统元年（1909年），岁在己酉，湖北首创劝业奖进会于武昌，开近代中国地方博览会之先河。次年，辛亥鼎革前夕，湖北教育官报发行所辑录展会文献，刊行《武汉劝业奖进会笔记》一册，虽卷帙无多，而存清末新政实业救国之实录，为研治武汉近代史者重要参考文献。

《武汉劝业奖进会笔记》未见著者姓名，但据湖北官报局刊行体例及内容笔法，可断为湖北教育官报发行所同人编纂，此在该书版权页上已有反映，言明“编辑者 湖北教育官报编辑所”。该所为清末湖北官报局（湖北官书局）下属机构，主司教育行政文牍及调查统计事宜。具体执笔者，包括《对于武汉劝业奖进会之感言》作者杨汝梅及

15篇各类展品调查报告作者计27位，当为湖北教育官报发行所专职调查员、编辑以及湖北各实业学堂教习和学生，其中尤以杨汝梅为最。

杨汝梅（1882—1966），湖北随县人，字予戒、玉阶。1903年东渡日本，入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习财政学、商学及近代博览会制度等；回国后任湖北商业中学堂首任校监（校长）；1909年清廷开经济特科、商科举，杨汝梅被授商科举人功名，当年武汉劝业奖进会举办，受聘为赛会总理教务，负责赛事舆论宣导、观展民智启迪、展品文教类目审定、评议人员遴选、赛后文献整理统筹诸事宜，并亲笔撰写《对于武汉劝业奖进会之感言》，是为全书之纲领。



该书出版者为湖北学务公所，发行者则为湖北教育官报发行所，为线装石印本，计145页290面，无分卷。首列“目录”，开篇“对于武汉劝业奖进会之感言”，次为“茧丝木材类调查”“药材类调查”“农产类调查”“机织类调查”“服装类调查”“矿产类调查”“树艺类调查”“竹木类调查”“染织类调查”“纺织类调查”“鞣革类调查”“绘画类调查”“陶

瓷类调查”“陶器类调查”“园蔬酱制类调查”等15类展品调查评论。版权页标有：宣统二年九月出版，宣统二年十月发行（定价三角），编辑者为湖北教育官报编辑所，出版所为湖北学务公所，发行所为湖北教育官报发行所（省城兰陵街）。

本书首篇《对于武汉劝业奖进会之感言》，约千余言。以留日归国者的比较眼光，对此次“中国地方赛会之始基”进行多维度的观察与评议。开篇即言：“吾国之通商互市以来，已为世界商战竞争之中心点，汉口襟铁路而带长江，又为全国交通之中心点。以言乎时，既如彼其迫切，以言乎地，又如此其便利，使于此而尚无准备竞争之策，是自弃也。夫自弃乌可以图存也？此武汉劝业奖进会之所由发生也。”透彻剖析武汉举办劝业奖进会之必然性。继而历陈劝业会之旨在“劝奖竞争”“为商战之利器”：“实业家各挟一求胜于人之希望，陈列其物品于会场，有陈列则有比较，有比较则有优劣，存

优劣则有竞争。至于竞争心生，则一切改良进步，精益求精之心思，自蜂起泉涌而不可遏”。

论述大体围绕三个层面展开：

其一，厘清近代会展概念。明确将武汉劝业奖进会定位为立中国地方赛会之基础，开中国实业竞争之先河，其发展前景未可限量：“登高自卑，行远自迩，办事之定例也。即赛会亦何尝不然！是故从赛会之种类论之，则由专门赛会进而为普通赛会矣。从赛会之范围论之，则由地方赛会进而为全国赛会更进而为万国赛会矣。今兹武汉劝业奖进会者，普通赛会也，地方赛会也。上宪所以提倡斯会之本旨，在以斯会示其模范实业家，对于斯会之规画不得仅以斯会满其志愿。天下事尝有造因小而结果大者，今日之武汉劝业奖进会造实业进步之因也，他日吾国所开之万国赛会即实业进步之结果也，斯会关系于吾国之实业进步也大而远。”这番议论，实际上是在西式博览会的参照系下，为中国的会展实践确立了一个清晰的坐标——地方赛会、全国赛会、万国赛会，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序列，武汉之会不过起点而已。他在文中亦对比外国赛会之成规，对会场的布置、陈列馆的构造排列、出品的征集及文字标注说明等一一提出意见，显系以日本劝业博览会之经验为衡量尺度。

其二，对武汉劝业奖进会的总体评价。对此次盛会的积极意义充分肯定。展会开幕后“观者络绎不绝，途为之塞”，市民踊跃之情可见一斑。政府免除税厘、官筹经费、宽定奖励等级等措施，亦为工商界所感戴。然其批评尤具深意。他指出会场借用官栈旧房，场地本已狭小，而“陈列室番号颠倒前后，毫无次序，观者稍粗心，即不免有见落之患”；出品标注“仅印有‘物名’‘产地’‘出



本省所造。他以日绸缎产品为参照，比较中日同类产品之优劣，对国货改进、畅销中外寄予厚望：“绸缎为吾国布中之精华，价虽昂而决不至为外货所压制，盖洋绸缎往往美丽其外，窳败其中，无耐久性故也。吾尝调查日本三越吴服店矣，其绸绢诸物之佳者，定价在吾国漳缎之上。审乎此，则吾国业此者苟能于织花着色等事重加改良，虽稍

将价值加昂，亦不足以妨其销路也。”

品人’‘制造者’‘价值’等文，而无‘用途’二字，致观者对于初见之物，徒羨其光怪陆离而莫悉其用法”；会场中亦未设休息处所与演艺场、动物园等辅助设施，于参观者之体验与吸引力皆有所欠缺。凡此种种，皆是以国际赛会之标准绳墨此会，虽近苛责，却切中肯綮。

调查评论为全书主体，为全书最见功力之处，著者依奏定劝业会章程，分15类逐项记述，每类或三四品，或七八品不等，计列展品237种，举凡展品之产地、制法、品第高下及优劣所在，无不详加考辨。其所持之标准，一以“能否与外货争利权”为衡，二以“是否合于近代工艺之法”为度，品评之间，识见卓然。今择其要者，述其大略。

其三，对参会展品优劣之品评。对展品之评价，持论公允，既见进步之可喜，亦察落后之可忧。就进步一端而言，“湖北兵工厂之军械、陆军工厂之洋式皮靴、武昌制革厂之洋式皮箱等，类能摹仿西式，使于此更求进步，则足以抵外货而塞财政上之漏卮；制麻局、武昌工艺实习厂、善技厂、汉之劝工院以及其他一二私立公司等出品中，不乏仿造洋货而得其精神者，尤可喜者，定价之廉亦不让外国货，将来销路正未可限量”。然其批评之辞更为峻切，湖北新式学堂林立，而教育品制造业却极不发达，“教育品以理化器械为最重要，然吾鄂理化器械悉购自外洋”，致使教育部部类竟无一物为湖北

将价值加昂，亦不足以妨其销路也。”

茧丝类，列浙江及本省沔阳、黄州、天门、汉川、江夏等所产土丝。编者注重与江浙名产相较，以定取舍：“论丝茧则浙江绍兴之新圆新长，湖北农业之叉圆青圆独，品居上上上，而其光泽鲜美，性质精良，诚为我前数十年所没经见。”

药材类，载本省巴东、蕲州、黄陂、竹山、兴山、长阳、保康、鹤峰、西陵、兴国、恩施之紫朴、桔梗、黄连、黄柏、杜仲、木瓜、蕲艾、木通、柴胡、玉竹、土苓、党参、独活以及吉林人参、安南玉桂、四川极品贡、黄山天生术、岷县野术、云南和浙江贝母、

广东化州橘红、杭州白芷、西藏沉香等。编者于各类药材之形状、色泽、功用包装及签定品位一一标明，指出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缺乏良好的包装：“包装者，所以保卫商品自生产以达消费间之军佐也。如或不然则昧保卫之功失商品之效。是包装之与商品有最切之关系，而药材尤有甚焉者，不能达消费之目的。商人固蒙其损并能变药品之性质，病者暗受其害，如兴国玉竹等含有糖素者，最易与水酸感化以致霉烂，服之非特失存之本性，且有意外之虞。此不可不改良者也。包装之法不一，要不外乎隔绝空气，不使接触商品。惜乎我国化学不昌，无人特制包装供献商界，大可惜也。”

农产食品类，对米、稻谷、芝麻、高粱、粟、包谷、黄豆、绿豆、蚕豆、豌豆、木耳、香菌、葛粉等，以省内外出产地进行评优之基础上，指出其不足之处：“大抵吾省所出农产多半有杂或虫伤，因不得储藏方法之故耳。”

机织类，认为丝绸及其他织物乃中国传统特产，但近代开放后外国织物竟为海关进口大宗，“外人以极廉之质，数倍其价以鬻于我，我犹趋之若鹜，此又大为虑者也”。希望引进近代工艺技术改进传统手工织法，以与外国商品竞争：“一由不求革新以投社会嗜好；一由不用廉质以为原料坐是，遂使社会心理几有舍外货莫用之势，良可慨矣。会中所陈仿造外货者不少，另出新式者亦往往有之，窃欲有以别之，因统分为固有与新出二部，或谓固有之品不足以抵制外货……中国固有之品，有久为社会所信用者，有独擅特质者如夏布之类，岂外货所敢颉颃。且我国尚未尽用外货，亦未始非固有品之精美有以维持也。是则新出者虽足以言抵制，不过抵制于外货既行之后，以视固有品之抵

制于前者已有间矣。特恨固有者无人以改良之、推广之，致不能与外货相抗耳。”

服装类，对陆军工作厂生产之服装评论较多，且注重与外国服装比较。“所制之军服，表面与洋货相将，工巧而价不昂。惜其呢料单薄，难久经风雨，是缺点也”“所制诸皮件，外视与洋货无差，质料之粗劣，则一见而知。幸目前制造之处不多，其价又较外国稍廉，销路尚畅，究不足以抵制外货也。今求改良之方，必先选精良之革加工精造，庶乎超过外国”。

矿产类，除对各地矿产详列述介外，对汉冶萍厂房、设施及产品尤做详细介绍：汉阳铁厂“轧钢版及钢坯大机图一万三千马力”“轧钢轨大汽机图一万二千马力”“轧小钢货汽机图六百马力”“铁厂一览图有二厂自大别山依汉水直上”“机器修理厂图经理者为外国人华人但从动作矣”；萍乡煤矿亦有多处介绍，“进矿处火车场图铁道纵横火车往来旁有多数房屋”“煤矿医院图树林荫翳景致甚佳”“前总办张公祠内设矿业学堂”“煤矿巡警处图巡兵排立约有五六百之多”；至于大冶铁矿列表介绍也有数处，“铁门坎开矿处图有多数房屋至铁道”“铁山堆一号矿处图屋宇排列铁道纵横树林亦多”“狮子山图山形高耸参差不齐有铁道由山直下”“制成钢轨图纵横堆聚甚夥”。这些，为汉冶萍研究者提供了一手直观史料。

树艺类，尤重茶叶出口贸易，因其“现占汉口输出口中之第一位者为茶”，但面临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调查光绪三十三年输出总额已达三千百七十四万海关两，此中绿茶大抵输出于亚美利加，合中国与日本红茶立于竞争之地位。红茶则输出于英国、俄国，近时在伦敦市场颇受印度茶、锡兰茶之排挤，然俄国西伯利亚及中亚细亚则为我国

所独占之市场”。指出中国茶叶种植与制造落后，若不思改进，则有失海外市场之虞：“中国茶业向来最盛，出口繁多，今者印度、锡兰各地俱加意种植，几欲夺我茶叶之利益，此大可忧之事也。而况此时茶叶之制法极旧，商情不固，若不急图改良，则出口之额每年平均七八百万两，诎可失他人耶。”寥寥数语，已非就事论事之品评，而是对包括茶叶在内的整个国家产业命运之深切忧虑。

总体看来，全书 15 类展品之调查评论，于每一类皆分列数品，细述其产地、成色、制法，间或有评述性文字，或褒或贬，或析其优劣，或指陈改良之方。其品第之高下，大抵视其能否与外货抗衡、是否采用新法、有无扩大用途之可能而定。其相互比较，既在同一品类之内——如黄丝与蚕丝、樟木与杉柏，亦在与外省外洋同类产品之间——如鄂丝与湖丝、土布与洋布、中国茶与印度锡兰茶等，持论公允，进步之可喜与落后之可忧，两面俱到。其征引之确、论断之严，至今犹为治清末经济史者所推重。

论及本书价值，约有三端：

其一，为中国近代博览会史之稀见文献。晚清劝业会，肇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京师劝工陈列所，继之有天津、江宁劝业会，然留有专书者极少。《武汉劝业奖进会笔记》为现存较早且体例完备的地方博览会实录，比《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1913）早 3 年，较《直隶商品陈列所概览》（1918）早 8 年，且较二书更详于产品调查。

其二，书中载 237 种 523 件展品之产地、形状、色泽、制法、评判，以调查者一手观察，留存了清末湖北乃至全国实业之“资源普查”和“体检报告”，既见“劝兴实业”之努力，亦察“一针一织仰赖外人”之困局，

其经济史价值，不在近代经济转型发展之宏大叙事，而在区域与部门经济微观肌理之梳理与剖析。

其三，为当代武汉城市文脉之珍贵遗存。书中所记展品产地，如黄冈蚕丝、咸宁木材、宜昌红茶，至今仍为鄂省特色产业；所议“改良土货以争利权”之精神，与今日“品牌建设”“老字号振兴”殊途同归。而“教育为实业基础”之论，更道出人才培养与经济振兴之辩证关系；书中所倡“精求制造，力挽利权”，犹堪作当下科技创新，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之座右铭。其论劝业奖进会与“劝兴实业”之关系，与当下武汉建设国际会展中心之宏图暗合。

百年前之“奖进会”迨至今日之“光博会”“华创会”，其“开风气而劝工商”之内核一脉相承；昔日武汉作为“东方芝加哥”内陆国际商业大港之雄心，在今日武汉建设国际交往中心之时代语境中激荡回响，悠远绵长。

涂文学，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汉口优秀历史建筑的流韵重塑

◇ 翁多嘉

武汉炎热的夏天，挡不住游人涌向江汉关、咸安坊、巴公房子的脚步，汉口历史文化风貌区一次次出圈爆红。有的一天徜徉于老街巷的转悠，惊叹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神奇之美；有的半晌伫立于一幢洋楼前，享受艺术审美的户外之旅。

汉口历史文化风貌区覆盖江岸老城区核心，大致在原五国租界范围，128 栋优秀历史建筑坐落其间，18 处里份纳入保护目录，共有 64 家列为市级以上文保单位。行走三五分钟，一定会遇到百年建筑，发现哥特式、罗马式、巴洛克式、文艺复兴式及折衷主义、新古典主义、现代主义等风格各异的建筑，鉴赏到中西融合的设计精华，犹如

穿行一条条艺术长廊，看不尽跳荡不息的流风美韵。

不用讳言，原五国租界的诸多历史建筑，烙上了鲜明的殖民主义印记，但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角度，又可看到它编年体般展示城市的近代化历程，同时承载色彩斑驳的人文艺术积淀——这一点，从事艺术教育的工作者，往往能有更深切一些的体会。

优秀历史建筑遗产是宝贵的，但重要的不是有多少留存了下来，而是有多少实现了嬗变，发生根本性的突破，获得有生命力的真正传承，反映一个城市的创造张力和博大心胸。

为此，本文选取 1993 年首批列为武汉

市优秀历史建筑的一座银行（金融建筑）、一家洋行（工业建筑）、一个巡捕房（警务建筑）为标本，观察汉口优秀历史建筑如何跨越时空，以美学再造和功能重塑，融入我们今天的文化生活。

金城银行转型武汉美术馆

中山大道与保华街相交的环岛，武汉美术馆可谓孩子们暑假的艺术殿堂，展览和研学交相辉映。可孩子们哪里知道，它的前身是金城银行大楼，日军侵华时期做过华中占领军的司令部和特务部。

金城银行1917年5月在天津创立，1918年开设汉口分行，1930年兴建大楼。大楼处于两条路环抱的独特三角地带，主体为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面向南京路十字大街，视觉优势极佳，呈现典型的西方学院派新古典主义之风。立面七间八柱铺展开阔，爱奥尼式巨柱贯通三层，21级高台基座托

起通高两层的拱券大木门，气象庄重典雅。当1931年特大洪水恣意汪洋之时，大楼“鹤立鸡群”免遭淹没，令人称赞建筑师的超前眼光。

金城银行为民族资本合营，与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一起号称“北四行”，秉持“实业救国”的理念，支持民族企业发展，在中国金融史上占有一席之地。1948年底，创办人周作民不惜用50万港币租用“华中”号轮船，悬挂外国商船旗号，协助中共地下组织，在香港转运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等爱国人士“北上”抵达华北解放区，使之如期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951年6月，周作民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安排，由香港直飞北京，下飞机后前往中南海，受到周总理接见和称赞。

1952年，金城银行加入公私合营银行。1957年，大楼设立武汉少年儿童图书馆，无数的“红领巾”在这里长成栋梁。1993年首批列为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2003年



金城银行 / 武汉美术馆

纳入现代美术馆建设规划。2008年，武汉美术馆开馆，跻身全国13家重点美术馆之列。2017年，武汉美术馆入选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

大楼规划改造过程中，保持主立面及沿街两侧外墙的建筑风格不变，同时按照现代美术馆的功能要求，对内部进行设计重组，增加中庭环廊式格局。原开阔的营业大厅改为公共艺术教育空间，原高朗的金库形成8.4米高的主展厅，原办公区布局为艺术家工作室。

2020年，武汉美术馆推出“艺术之城：金城银行前世今生（1930—2020）”展览，武汉美术馆馆长陈勇劲在前言中表示：金城银行是一个金融机构，展览立足于建筑的角度来叙述不同时间段的功能认同，以及在某个阶段的“身份”转移对其将来的社会影响所带来的时效作用。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功能设定，都会由此引发一段历史，还有背后的故事，合成了金城银行作为建筑内在历史演变的自身结构。如今，当武汉美术馆成为金城银行现在的身份，并且就在这座老房子里做一个与之相关的展览，是希望通过对过去和今天的讲述，让观众能够在史料的浏览中、艺术品的观看里，发现和重塑“金城银行”对于武汉这座城市发展历程的作用与价值。

金城银行邻近的大孚银行，解放后长期也是武汉图书馆外借部，后来开设“物外书店”名噪一时，现由“江城书房”入驻；少年儿童图书馆则迁至南京路原汉口商业银行大楼，两处金融建筑均利用为城市文化场所。

武汉的金融建筑较多，且集中于沿江大道、中山大道、江汉路沿线，如花旗、德华、汇丰、麦加利、东方汇理、华俄道胜、

横滨正金等外资银行，更有交通、实业、盐业、中南、大陆、四明、国货、永利、上海商业、浙江实业、浙江兴业、广东、台湾、聚兴诚等中资银行，如今大部分仍为金融企业使用，也有少量转换功能。建于1895年的华俄道胜银行，因宋庆龄于1926年12月随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在此居住工作8个多月，2002年列为湖北省文保单位，2011年修缮为“宋庆龄旧居”。

平和打包厂变身武汉设计之都文创空间

汉口金融业发达，必然与商业、工业相辅相成，因而洋行（外资公司）比比皆是。特别是沿江大道一带，洋行大楼林立，日清、太古、怡和、宝顺、三菱、安利英、亚细亚



平和打包厂主楼

等，大多从事航运贸易，因此需要配套打包厂和储运仓库。今青岛路麦加利银行对面，就有一家六栋相邻的欧陆风格建筑，组合为平和洋行，从事棉花、羽毛、牛皮等加工打包，老汉口人习惯叫它平和打包厂或棉花打包厂。

平和打包厂隶属英商，经营与太古轮船联动，1905年由里德尔（又译黎德尔）兄弟创立，用机器将物品打包之后，通过长江轮船到上海，再海运至欧洲腹地，为其工业输送原料。

最初，平和打包厂为一座四层砖混结构建筑，总建筑面积32808平方米，大小房间上百，空间高大实用，楼板整体现浇，立面使用圆券简洁处理，檐口装饰线脚精致美观。它通体红砖砌筑，窗间壁柱分割，窗子下方装饰一段灰色拉毛墙面，大大提升了艺术情调，应该是欧式近代工业建筑中的典型。

后来，平和打包厂建筑发展到六栋，分别建造于1905、1918、1933、1949年，宛如一座巨大的城堡，是武汉最早的大型钢筋混凝土建筑，也是现存最完整的早期工业建筑。不同年代的建筑，风格各具特色，厂房规模庞大，内部结构完好，1953年起作为武汉商业储运公司仓库使用，得到厚待。1993年首批列为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2011年列为武汉市文保单位，2012年列为武汉市一级工业遗产，开始向打造“武汉设计之都”文创空间进发。

2017年，平和打包厂修缮启动，复原清水红砖墙面，保留所有工业构件，通过一道道玻璃连廊，将封闭孤立的单栋楼房串联起来。正是扑面而来的“复古工业风”，恰好为书店、剧场、买手店、设计所等看好，吸引来近百家文创科技企业。更有文艺青



平和打包厂文创空间廊桥

年，游走于纵横错落的楼梯上，定然有探索迷宫的新鲜刺激，钢梁、铁架、阀门、管道、车床、摇铃、消防桶、起重机都是老物件，摸上去感受到历史的冰凉，也体验着文化的温度。

2019年，武汉解放70周年，平和打包厂迎来国际设计盛宴。11月1日，以“精致·城市”为主题，“武汉设计日暨第五届武汉设计双年展”开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之颁发“2019年度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荣誉奖”。

“武汉蕴藏着巨大宝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办事处文化项目专员说：“今天的会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很欣喜

地看到，武汉通过对建筑结构的最小改造，为这个老建筑带来新生，将文化与历史融入现代城市建设中，同时将传统建筑融入人们的社区生活。”

从此，每年的11月1日确定为“武汉设计日”，主要活动时常落户平和打包厂。与英商太古洋行变身长江航道工程局办公楼、日商日清洋行转型好百年酒店明显不同，平和打包厂的核心路径：文物保护性修缮+文创业态化重塑，完成从百年老旧厂房到“多牛世界时尚创意产业园”的蝶变，2025年入选第十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

德国巡捕房改建武汉警察博物馆

汉口从1861年开埠到1949年，前后设立12个外国驻汉领事馆，主要为英、法、俄、德、日、美、瑞典、比利时、意大利等国，馆址设在五国租界区域。

其中，德国领事馆1895年落成，解放后一直为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使用，从江滩都可以看到它浓郁的异国情调。它虽然只

有两层楼，但高近23米，红瓦四坡顶、黄色拉毛墙面、圆形穹顶角塔、回廊环绕阳台，典型的德国巴洛克（亦称维多利亚）风格。1993年首批列为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2006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德国领事馆建筑开辟为武汉国际友好城市赠礼展厅，2025年10月18日起向社会开放，是市民一览全球16个友好城市艺术精品的好地方。

相较于德国领事馆，德租界工部局巡捕房改建为武汉警察博物馆，更是功能重塑的一个样板。昔日洋巡捕作威作福的魔窟，转型为展示人民警察风貌的窗口，在2019年武汉解放70周年时开馆，具有特别的意义。

德租界工部局巡捕房主楼1909年建成，是汉口的租界区唯一留存的巡捕房类型建筑，见证了列强侵犯中国治安权的历史。建筑主体属文艺复兴基调，局部融入德国及北欧元素，高耸的钟楼、陡峭的屋顶、拱形的长廊墙体、尖穹的长方门窗有机组合，体现出维多利亚时期的折衷主义风格，1993年首批列为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



德租界工部局巡捕房旧址和武汉警察博物馆

在抗战时期的空袭战火中，德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屋面受损严重，钟楼炸毁后改为平顶瞭望台。2017年，武汉市公安局请来上海专业设计师，对照原图实现建筑还原，重建15米高的钟楼尖塔。

走进武汉警察博物馆，从序厅、晚清、民国到解放新生、改革开放共五个板块，以1902年武昌警察总局成立为历史起点，以人民公安制度构建为主体，再现晚清以来武汉警察制度的沿革与发展。三大“镇馆之宝”——中国首架警用直升机、哥特式霍伯钉保险柜、新中国第一本机动车驾驶证（编号00001），标志着江城走在前列。历史实物展出是博物馆的一大特色，自行车驾照、板车牌照、户口簿页码看似寻常，记录着时代变迁的点点滴滴。2021年1月，中国人民警察节纪念邮票首发活动选点武汉警察博物馆举办，现场情景交融，氛围独特。

武汉警察博物馆在三楼特设文化创意空间，观众在鉴赏830件文物之后，可以来此挥洒才情，从事艺术创作。散落全馆的18个布偶场景、20幅画作、5套多媒体场景，同时也释放着艺术气息。

总之，汉口历史文化风貌区丰富多样，优秀历史建筑美不胜收。通过触摸上述三个标本，我们充分认识到：对于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开发“三位一体”，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和艺术美感，融入公众时尚消费业态，不仅能“重现风貌”，更能“重塑功能”，促使“历史风貌保护”与“城市有机更新”相得益彰。

美学理念重在体验，艺术教育重在现场，只要让优秀历史建筑由“古旧”变为“经典”，真正成为公共文化空间，它就可亲近、可品读、可享受，叫人流连忘返。如巴公房子“修旧如旧”，采用10余项传统工艺，

动用56万块红砖，重现历史肌理和艺术特色，一经开放便登顶全国“网红”。由此带动远方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在“寻访武汉老街，悦读城市故事”之中。

汉口优秀历史建筑的整体面貌，集中体现了武汉人“海纳百川”的精神气度，既是楚风汉韵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异彩融汇，也必将在新时代的城市更新中风华重塑。

主要参考文献：

[1] 武汉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通览》，武汉：武汉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

[2] 王汗吾、吴明堂著：《汉口五国租界》，武汉：武汉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版。

[3] 武汉市江岸区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大江金岸——汉口历史风貌区图志》，武汉：武汉出版社，2023年2月第1版。

翁多嘉，湖北省艺术教育协会副秘书长

敬移老校长李达骨灰安放八宝山

◇ 任 怡

李达（1890—1966），号鹤鸣，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原零陵县）人。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中共一大上海小组代表，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

李达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党的创始人之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哲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哲学

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今称院士）。1953年2月至1966年8月，李达任武汉大学校长。毛泽东曾称赞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

两次平反

1966年8月24日，身患重病的李达含冤逝世，此后骨灰存放在武汉九峰山革命烈士陵园骨灰堂，1996年9月才移至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距他逝世已过去了30年。

为什么会这样？有同事对我说：“你爸爸任珍良曾任武汉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他应该知情。”一个星期天，我回家问父亲。父亲会心一笑地对我说：“当年我是具体的操办人。”沉思了一会儿，父亲娓娓道出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李达同志有两次平反”，父亲说。

1973年11月，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下，李达冤案得到初步平反。



建党时期的李达



1974年，李达同志追悼大会在九峰山革命烈士陵园举行

1974年1月23日，李达追悼会在武汉九峰山革命烈士陵园举行，骨灰存放在陵园骨灰堂。

1980年6月26日，中央书记处第32次会议讨论决定，将李达骨灰移至北京八宝山骨灰堂一室正面安放。但亲属在李达评价的措辞表述和骨灰迎接规格上，与有关部门未达成一致意见。

1980年10月26日，李达得到彻底平反昭雪，但骨灰进京安放问题悬而未决。每年清明节期间，在京居住的李达夫人石曼华和儿子李心天（李达与前妻王会悟之子）等亲属来武汉九峰山祭奠，武汉大学负责接待。

亲属意愿

1993年11月29日，武汉大学举行建校百年庆典，决定在校园设置与武汉大学相关的名人雕像。一年后，由武汉大学深圳校友会捐建的李达雕像落成。李达亲属参加落成典礼时，向校长陶德麟提出可否将李达骨灰安放在雕像基座之下。考虑到武汉大学兴建珞珈山校园时发生过“迁坟风波”，时任校长王世杰立有珞珈山校园不得有坟墓和存放骨灰的校规，陶德麟只好解释婉拒。

1995年初，武汉企业家茅永红在江夏筹建龙泉山孝恩陵园，造访武汉大学时提出在陵园划地一亩，建李达纪念馆，塑建李达全身像，其骨灰安放在基座之下，全由陵园出资，希望武大给予支持。

当年秋季，李达夫人石曼华来汉，住在武钢职工李冰梅家里。李冰梅是李达的侄孙女，李达的骨灰存放证和钥匙由她保管。陶德麟探望石曼华时转达了茅永红的意愿，石曼华委托陶德麟实地考察。当天下午，陶德麟率队赴陵园考察，父亲和学校校友总会办公室主任张怀群陪同。当晚，陶德麟用电向石曼华反馈了考察情况。

1996年6月，石曼华、李心天专程来汉，提出请学校出面，将李达骨灰移送八宝山。他们表示：因为年事已高（石曼华75岁、李心天71岁），行动多有不便，每次来汉又是学校破费安排，增添的麻烦太多。龙泉山的方案虽然用心良苦，也有类似的不方便。如果骨灰在八宝山，祭奠的困难和麻烦都少了，亲属也可都随时去看看。



李达漫步在武汉大学樱花大道上



1958年，毛泽东主席与李达在一起

学校主要领导表示充分理解和积极努力，但信心不是很足。任心廉书记当年在湖北省委科教部任副部长，对李达的平反和骨灰安放情况较清楚，私下对父亲说：按照李达的身份和地位，骨灰进八宝山安放肯定应该，平反时中央也有决定，但因意见分歧搁浅了，现在做“回头”工作会有难度。尽管如此，学校党委和行政领导还是很重视，并派父亲具体操办这件事。

赴京汇报

父亲先是拜会湖北省委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史正江，请他参谋参谋出个主意。史正江是武汉大学哲学系1984届毕业生，也是陶德麟校长的学生。他鼎力相助，先是引见省委组织部办公室干部蔡方胜和秘书长黄波，后又帮助协调方方面面。

黄波和蔡方胜表示省里肯定支持，建议学校先到中组部汇报亲属的意愿，需要省里帮助，省里一定义不容辞。

1996年7月，父亲到中组部汇报。中组部老干部局负责审批八宝山骨灰安放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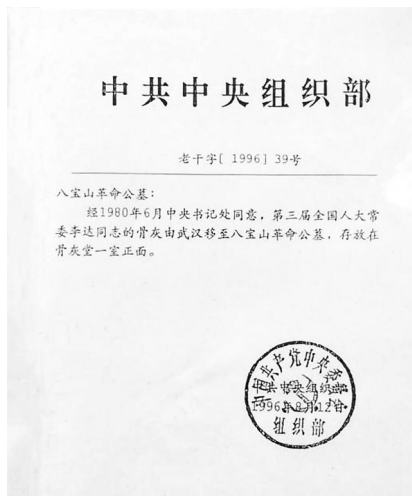
作。在老乡、校友、中组部组织局副局长徐祖发的帮助下，父亲拜见了老干部局局长傅思和。傅局长对情况很熟悉，当即表态说，李达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央早就同意他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这是历史遗留问题，请湖北省委来公函，老干部局可以批。

回汉后，父亲立即向学校领导和省委组织部领导作了汇报。在黄波的帮助下，父亲得到湖北省委的公函，到中组部老干部局汇报。傅局长二话没说，批准李

达骨灰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正面安放，属于最高规格。批文文号是中央组织部老干字〔1996〕39号，批准时间是1996年8月12日。

有了中央批文，后续工作应该很顺利吧？我打断父亲的回忆问。

父亲继续讲，中组部和湖北省委组织部领导反复交待，各方面都要重视并配合，尤其要做好亲属的工作。省委组织部转达中组部老干部局的意见：前面的时机已经错过，这次骨灰安放时领导不讲话，亲属不能看到



中组部批文

中组部领导来了，临时又提出一些要求。亲属中要有一位说话算数的人来主事，共同配合做好工作。

8月下旬，父亲和学校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政研室主任陈庆辉、校友总会办公室主任张怀群，专程赴京向石曼华、李心天等主要亲属传达上述意见。石曼华、李心天代表亲属一再表示非常感谢中组部、湖北省委和武汉大学，一定配合组织安排。经协商，李心天提前一天来汉，参加护送骨灰到京。

敬移安放

9月9日晚，为确保李达骨灰安放顺利进行，省委组织部老干处处长陈其元、父亲和张怀群乘T38次火车赴京。10日，与在京的武汉大学副校长夏都锟联系，安排后勤保障事宜，包括实地考察八宝山骨灰堂一室、办理安放手续、预约安放时间、购买骨灰盒（4000元，为当时八宝山最好的骨灰盒）、联系安保、购买花圈、安排车辆及食宿等。

11日下午，李达骨灰从九峰山迁出。当晚，护送人员在汉口火车站乘T38次火车赴京。护送骨灰的有：省委组织部副厅级组织员曾瑞潜，省委老干部局副局长祁纪才；武汉大学党委书记任心廉、校长陶德麟。在汉口火车站送行的有：湖北省委副书记杨永良，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黄远志，省委高校工委书记余凤盛，以及武汉大学学校领导、教师代表和在李达身边工作过的部分工作人员50余人。

12日上午，李达骨灰到达北京西客站，在站迎接的有：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副局长级干部张家显，湖北省委组织部老干处处长陈其元，湖北省驻京办事处主任王忠望，武汉大学副校长夏都锟，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副

主任关兆东；李达夫人石曼华、儿媳余国膺、大女儿李心怡、小女儿李媛媛、小女婿崇泉等。

下午3点，李达骨灰盒安放在一室面对大门墙壁的正中间，十分显眼，这与他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的身份十分契合。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参加安放仪式并慰问亲属的领导有：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铁林、国家教委副主任张天保、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局长傅思和。

父亲受托主持李达同志骨灰安放的简短仪式。新闻媒体对仪式作了报道。

湖北省委组织部、省委老干部局和武汉大学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承办了李达同志骨灰敬移的具体事宜。石曼华、李心天代表亲属表示非常满意，十分感谢。

我饶有兴趣地听完父亲的讲述，疑惑顿消。在这里，我引用李达生前的科研助手，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原校长陶德麟生前的一段评说，表达对李达老校长的缅怀。陶先生曾深情地说：李达同志难能可贵之处主要在于两点，一是他毕生把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融为一体，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作出了常人很难作出的业绩；二是他毕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种坚持真理无私无畏的忘我精神，决不附和那些他明知其为错误的东西。我想，仅凭这两点，就足够我们去继承和发扬了。我相信生活在今天新条件下的年轻人，会从这位历史人物身上学到应当学到的东西。

任怡，武汉大学泰康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副院长